关于清除党內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一）

（党內文件・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监察委員会办公厅編

出 版 說 明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的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爭，在我們党內揭露出一批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有的並且在党內竊据了重要的职务。把他們揭露出来並清除出党去，这对我們党的巩固和純潔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具有重大意义。

現在我們蒐集了有关党的組織对曾經担任过党的省委委員或相当于省委委員以上职务的三十九个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这些决定都已經中央批准），編成这本小册子，供地方县級以上的党員幹部閱讀。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目　录

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楊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

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全省四級幹部会議和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議，遵照党中央的整風方針，採用大鳴大放大爭的方法，徹底地揭發和批判了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長沙文汉，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長楊思一，省委常委、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彭瑞林，省委委員、省委財貿部部長孙章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惡活动。代表大会一致認为：这是浙江党組織內一場兩条道路的原則斗爭。这場斗爭的胜利，对于巩固和純潔党的組織，加强全省各級党組織在中央統一領导之下的坚强团結，增强党的战斗力，具有極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会議揭發的材料說明：沙文汉和楊思一兩人已經完全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在党內的代理人。在今年春天大鳴大放期間，沙、楊兩人和党內外的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亲如兄弟。沙文汉积極支持右派分子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等对党的猖狂进攻。楊思一同李士豪的关系極为密切，多方掩飾李士豪的反动面貌。在反右派斗爭中，沙文汉、楊思一兩人又狂妄地抗拒中央的方針和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計地包庇宋云彬和李士豪，破坏反右派斗爭，並且在事后还多方掩飾，拒不交代。会上揭發的材料說明：沙文汉、楊思一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貫的。在一九五六年浙江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期間，他們就結合在一起，惡毒地向党进攻。沙文汉在那次大会上

宣揚資产阶級的政权观点，誣蔑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反对党对政权工作的領导，並且支持以黃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的資产阶級文艺路綫。楊思一除了积極支持沙文汉的反动的政权观点以外，还捏造事实，惡毒地否定全省几年来的工作成績，歪曲党內生活真相，自吹一貫正确，冒充群众代表，攻击党的領导。在肃反运动中，沙、楊兩人对党的肃反政策也心怀不滿，楊思一並誣蔑肃反五人小組違反党的組織原則。代表們还一致指出：楊思一几年来一貫坚持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立場，在党內拉攏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甚至發展到在省委常委內部划圈圈，处心积虑地制造党的分裂。沙文汉在工作上長期不負責任，而且生活腐化、道德敗坏，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此外，沙、楊兩人几年来还安插了許多反革命分子、叛徒和政治面貌不淸的分子，到国家机关和企業事業机关工作。

会議揭發的材料說明：彭瑞林在最近整風期間，在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議上，利用大鳴大放的机会，惡毒地向党进攻，誹謗省委是右傾机会主义，誣蔑省委常委会"有負中央負責同志、有負党代表大会和省委会的委托"，完全否定了省委領导的正确性和全省的工作成績。会議揭發的材料說明：彭瑞林的反党活动也是一貫的、严重的。二十年来，他不断向党鬧个人地位和待遇，長期对党不滿。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他更从严重的自由主义發展到在党內造謠生事，挑撥离間，搬弄是非，支持沙文汉和楊思一，拉攏一些人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去年全省党代表大会期間，他和孙章录等結合在一起大鬧主席团，破坏主席团对于大会的正常領导。他平时常以"炮手"自命，实际上是一貫猖狂地反党。

会議揭發的材料还說明：孙章录几年来在党內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宗派活动。他經常搬弄是非，煽动对党不滿情緒，企圖制造混乱。去年全省党代表大会期間，他是反党宗派活动的主謀者。他为了达到个人的卑鄙目的，背着主席团召开会議，組織破坏性的發言，造成会議的混乱，並且和彭瑞林等結合起来，反对

党的領导，一度使会議形成兩个中心，使領导有陷于分裂的危險。他还在省委書記处的人选問題上进行非組織活动。在中央負責同志对他作了严肃的教育批評以后，仍然採取抗拒态度，繼續到处散布流言蜚譛，在其他同志中进行煽动，誹謗中央負責同志的批評是"压服"，誣蔑省委謊报情况，"借外力来解决內部問題"。

代表大会着重地指出：沙文汉、楊思一、彭瑞林、孙章录等長期坚持錯誤，拒絕党的教育和批評。在去年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央負責同志对他們四人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和批評，省委对他們进行了耐心的教育，等待他們的覚悟。但是，他們一直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並且繼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直到今年整風期間和这次会議上，他們的态度仍然極其恶劣，在到会代表一致譴責之下，他們才被迫承認一些罪行，但是並無悔改誠意，自絕于党，自絕于人民。

代表大会一致指出：沙文汉、楊思一、彭瑞林和孙章录所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活动，对于党的事業所造成的危害，是極其严重的。应当看到，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領导，由于全省人民和全省各級党組織的努力，浙江几年来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全省各級党組織基本上也是团結的。但是，由于沙文汉、楊思一、彭瑞林、孙章录一直进行着公开的和秘密的反党活动，已經严重地損害了党的威信，損害了党的团結，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党的統一集中的領导，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給全省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損失。因此，必須把他們清除出党。只有这样，才能維护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純潔，更坚强地团結在党中央的周圍，一心一德，依靠广大群众，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的历史任务。

沙文汉、楊思一、彭瑞林、孙章录所以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右派，不是偶然的。我們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历史时期。資产阶級正在被消灭，資产阶級分子正在被改造，資本主义所有

制基本上被消灭了。但是，阶級斗爭还沒有熄灭，資产阶級政治观点和資产阶級世界观还在很多人的头腦中存在着，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思想之間的斗爭，还將存在一个很長的时期，这种斗爭不能不在党內反映出来。特别是在政治上阶級斗爭激化的时候，党內的这种斗爭也必然会激化起来。沙文汉、楊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瘋狂地进行反党活动，並且直接間接地和社会上的右派同流合污，一唱一和，最后和党分裂，正是这个矛盾和斗爭的具体表現。应当特别指出：沙文汉、楊思一、彭瑞林、孙章录都是出身于非無产阶級的知識分子，在入党以后長期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覚性，一直保持着資产阶級思想，一有条件，就力圖使用他們的影响，企圖按照他們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把他們的意志强加于党。在資产阶級反动思想影响下，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就必然發展成为修正主义者，在組織上必然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活动，这是他們終于墮落成为右派分子的社会历史根源。

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是万惡的根源。沙文汉、楊思一、彭瑞林、孙章录都是極端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者。他們都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念念不忘个人的名利、地位。在他們看来，个人利益比什么都重要，至于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对于他們都是空話。因此，当他們無限制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滿足的时候，就必然要对党不滿，並且一步一步發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步。这是他們墮落成为右派分子的思想根源。

代表大会認为：指出沙文汉、楊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墮落成为右派分子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認識根源，是为了提醒全省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員，認眞地吸取教訓，努力加强党的組織工作和思想工作，加强党性鍛煉，为保持党的純潔和团結統一而作經常不懈的努力。

代表大会經过討論以后，一致决議：沙文汉、楊思一、彭瑞林和孙章录是党內的右派分子，决定撤銷他們党內的一切职

务，开除党籍，在党內外公布，並且向有关方面建議撤銷他們的一切行政职务。

代表大会認为，为了巩固全省党組織在党中央領导下的团結和統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全省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員必須按照党章和党中央历次指示，切实遵守下列各項原則：

第一、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一定要有大公無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百折不撓地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反对鬧名誉、鬧地位、鬧待遇，反对斤斤計較个人得失，反对驕傲自滿、自以为是、独断專行。

第二、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維护党的領导，反对自由主义、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坚决地执行党中央和上級党組織的决議和指示；反对擅自修改党的政策、改变党的任务的無組織、無紀律的分散主义傾向。

第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發揚党內民主，經常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虛心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評和监督；反对只能受表揚，不能受批評的錯誤态度；禁止对批評者进行打击报复。

全省各級党組織应当將本决議向全体党員深入地傳达，結合实际情況，認真組織討論，克服党內存在的各种錯誤傾向。还应当在加强党的統一集中領导的同时，繼續發揚党內民主，放手發动群众，开展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眞正实現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潑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便团結全省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关于同意清除右派分子孙作宾等出党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二屆委員会第五次全体会議（扩大），徹底揭發和粉碎了党內右派分子孙作宾、潘光亞、刘杰、高繼先等的罪惡活动，將他們清除出党，並报經中央批准。这是反右派斗争在党內的重大胜利，对于青海地区党的建設和社会主义事業，具有極其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二屆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一致認为：省委第二屆第五次扩大会議，对于党內右派分子孙作宾等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二

右派分子孙作宾，是窃据在省委領导核心內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家，是資产阶級、牧主阶級在党內的代理人。省委同他的根本分歧是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爭，是馬克思主义原則同反馬克思主义原則的斗爭，是党的正确路綫、方針同反党的路綫、方針的斗爭，是加强無产阶級專政和党的領导同取消無产阶級專政和党的領导的斗爭。孙作宾在青海的主要謬論和罪惡活动是：反对畜牧業社会主义改造。說畜牧業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不走合作化”，也“不要搞公私合营牧場”，所謂“办法”是依靠牧主阶級“自动放棄剝削”，鼓吹“果洛地区兩年內大体可以放棄旧制度”。他的資产阶級路綫是自上而下，依靠头人，

說“抓过来上層，就会抓过来群众”。夸大民族矛盾，根本否認牧業区有阶級存在，反对阶級斗爭。說牧業区“上層、宗教、群众是三位一体”。說上層人物和共产主义幹部是“父子关系”，压制劳动牧民反抗牧主剝削和压迫的正义要求，窒息阶級斗爭力量。他把一切問題都归罪于“大汉族主义”，把汉族幹部丑化成“大汉族主义者”。反对無产阶級專政，反对肃反。到处污蔑“肃反过火，宽枉了好人”，还指示根本沒有进行肃反的果洛地区也要“平反”，又积極破坏反右派斗爭，他把右派分子看成是我們塑造的。公开包庇右派分子，糾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並令右派分子潘光亞搜罗了五百五十一条“意見”，作为攻击省委的毒箭。反对平息武裝叛乱的方針。說川北、川西及本省河南县达参部落的叛乱是大汉族主义造成的，否定其反革命性質，說“不該打”。反对党的領导。要民族上層人士当“司令員”，我們当“参謀長”，还要全体幹部团結在上層人物周圍，“他們同意什么，就作什么”，否則就是“强加于人”。反对省党的第二屆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建設方針，反对工業建設，提倡多修寺院。由于他的資产阶級政治观点，因而也在生活作風上腐化墮落，工作一貫不負責任，甚至电报、公文和报紙都要由秘書唸給他听。

上述鉄的事实，充分說明孙作宾是頑固地反对中央的路綫、反对省委的領导，兇惡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孙作宾的反党活动其所以危害性大，是由于他的党齡長，窃取了高級职位，並披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玩弄兩面派手法，勾結右派分子潘光亞、刘杰等，进行宗派活动，組成反党集团，企圖夺取省委的領导权，以达到其个人野心家的罪惡目的，夢想实現其修正主义綱領。孙作宾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制造了“白区党”、“苏区党”的謬論，在甘肃工作时又提出所謂“甘人治甘”，搞小集团，闹地方主义。孙作宾等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非無产阶級的立場沒有根本改造，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一直在發展

着，当社会主义革命繼續深入的时刻，便公开背叛党，瘋狂地向党进攻，反对革命。省委为了堅持党的路綫、方針，曾对孙作宾等作了長期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斗爭。但是，他們繼續堅持其反动立場，毫不悔悟。在全面檢查孙作宾的反动言行开始时，他竟私逃蘭州，逃避斗爭。省委第二屆第五次扩大会議，徹底淸算了他們的罪行，並以这些反面教材教育全体党員，从思想上消除他們所造成的影响和毒素，是絕对重要的工作。

三

右派分子孙作宾的政治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一系列根本問題上，完全違反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原則，成为徹头徹尾的修正主义者，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無恥叛徒。他的修正主义，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个問題上：

1、社会主义是各族人民徹底解放的根本道路。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須解放生产力，从經济基础上改变私有制。必須在党的領导下，堅决發动和依靠各个民族的劳动人民，經过激烈地阶級斗爭，才能取得眞正的胜利。为了保証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各个民族的局部要求，必須服从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共同的革命斗爭利益。而孙作宾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無产阶級革命的学說，違反社会發展規律，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瘋狂地阻挠和破坏畜牧業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义关于阶級和阶級斗爭的学說，宣揚牧主阶級可以“自动放棄剝削”，鼓吹剝削阶級与被剝削阶級“阶級合作”。

目前，青海地区社会主义革命飞躍發展的事实，进一步批駁了孙作宾的修正主义。在牧業区翻天复地的改造高潮中，广大劳动牧民是热烈拥护社会主义的，要求合作化如飢似渴。各州已建立一千多个牧業社，海西、海北、海南已先后基本实現了合作化。事实也証明，牧業区不仅有阶級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阶級斗爭非常激烈。广大牧民群众，經过社会主义大辯論，痛哭流涕，訴出千年苦水，万年仇恨，从而正在把自己进一

步組織起来，徹底整頓和改造基層政权。牧主阶級中的部分人，由于大势所迫，人心归向，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而少数死硬派則勾結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分子，掀起武裝叛乱，要同共产党較量到底，作垂死挣扎。这完全暴露了反动阶級的猙獰面目。阶級斗爭的烈火，是徹底燒燬了所謂“推动牧主自动放棄剝削”的胡說。

事实教育我們进一步認識：畜牧業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牧業区各族人民繁荣和發展的方向。絕不能借口民族特点，而放棄这个共同道路。因为，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对于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每个民族內部都分裂为剝削与被剝削兩个根本对立的阶級，这是客观存在的。阶級的消灭，只有經过阶級斗爭的道路，才能达到。任何否認民族內部沒有阶級存在和阶級斗爭，都是資产阶級民族观点，只能模糊阶級斗爭的观念，必須徹底清除。革命不容許麻痹人民群众的阶級斗爭意志，不容許在精神上解除武裝。自然，阶級斗爭的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反革命武裝叛乱不过是反改造的阶級斗爭形式之一，也是阶級斗爭的最高表現，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阶級斗爭还將持續一个时期。

2、党的統一战綫是阶級斗爭的武器和特殊形式，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統一战綫政策就是阶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在过渡时期，統一战綫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減少阻力，增加助力，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共产党是統一战綫的領导力量，社会主义是統一战綫的政治基础。而孙作宾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統一战綫的理論，以及历史是人民群众創造的、人民群众必須自己解放自己的理論。只要上层，不要群众，說“抓过来上层，就等于抓过来群众”，夸大民族上层的作用，“号召”党員团結在大牧主的周围。

事实教育我們进一步認識：党的統一战綫政策是完整的阶級路綫，旣要团結又要斗爭。团結是为了調动积极因素，以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从当前牧業区阶級斗爭形势看，以往对上層分子斗爭和改造不够。今天，其所以强調对他們的改造，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要从經济上消灭牧主所有制，从政治上徹底摧毁封建統治和特权。統一战綫工作，还必須与群众工作相結合，統一战綫工作原为群众革命运动的順利进行，而群众的革命运动則是实現历史使命解放自己的根本力量。目前，在牧業区掀起了翻天复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改变了几千年封建所有制、創造了新的政治局面的，正是在共产党領导下的广大劳动牧民。

孙作宾等也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問題的理論，把宗教教义說成与我們党的政策是一致的，極力夸大宗教影响等。而馬克思主义者則認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煙，宗教和共产主义是根本相对立的。正如恩格斯說的：“尽管聖經中若干地方似乎有利于共产主义，但聖經教义的一般精神……对共产主义是絕对敌視的”。特别是牧主阶級將被消灭的时刻，便比任何时候更無恥地要利用宗教来控制人民，用来瘋狂地反抗社会主义。因此，党对宗教和寺院的工作必須加强。在工作中，应把反动阶級利用宗教来作为阶級斗爭工具和群众的一般信仰严格区别开来。凡是利用宗教作掩护来反抗社会主义的，必須剝开他們的反动面目，打碎“保护宗教利益”、“保护民族利益”的招牌，並应坚决鎮压。对于一般爱国守法的宗教職業者，要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使他們拥护社会主义，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不允許有任何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对于群众一般宗教信仰必須尊重，因为，宗教对人們的影响有着它的历史原因。我們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須积極向劳动人民进行阶級教育和科学知識的教育，使他們正确地認識社会現象和自然現象，树立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党員和共青团員，要經常地进行共产主义和正确地对待宗教問題的教育，务使他們分清共产主义与伊斯蘭主义、釋迦牟尼主义，分清党的政策与宗教教义的根本界

限，必須徹底确立共产主义思想。

3、無产阶級專政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根本条件，而專政的核心是共产党的領导。党是各族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無产阶級的战斗司令部。而孙作宾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無产阶級專政和党的領导的学説。宣揚牧主上層的作用，又反对平息牧主上層和反革命的武装叛乱，不从反动阶級本質上去寻找叛乱根源，却說是大汉族主义造成的，阻止向牧民群众进行阶級教育。

事实教育我們进一步認識：历次的反革命叛乱，都公开叫囂"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顚复人民政权，也杀害本民族共产主义幹部、劳动人民中的积極分子及上層人士中的进步分子，企圖維护剝削阶級的經济利益，与封建統治制度。省委以往对于叛乱，採取了坚决平息的方針，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在最近，一面用武力平息反革命叛乱，打击最兇惡的敌人；一面大刀闊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更有利于迅速实現社会主义改造，徹底摧毁牧主阶級的經济基础和政治势力。叛乱是坏事，但是坏事中有好事，經过努力是可以变成好事的。如最近的叛乱，既有利于肃清反革命分子，又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实現，並且徹底改造了基層政权，眞正实現了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四

自省委第二屆五次扩大会議，清算了孙作宾等反党罪惡活动之后，青海地区党的生活中，出現了意志更加一致而又生动活潑的气象，各方面均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躍进局面。为了从各个方面徹底消除孙作宾等反动的思想影响，更好地貫徹执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我們必須：1、徹底地改造自己，兴無产阶級思想，灭資产阶級思想。一切具有严重地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在政治上总是不坚定的，容易受資产阶級的影响，也正是陰謀分子的市場。每个共产党人，必須徹底克服

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忠心耿耿地献身于共产主义，在任何風險中站稳無产阶級立場，明辨風向，高举革命紅旗。同时，要善于把坚持原則和創造精神結合起来，在坚持眞理的原則下，敢想、敢說、敢做。迷信必須打破，所謂青海落后的論調必須批判，自卑心理必須克服。鼓足革命幹勁，坚定胜利信心。2、增强党的团結，維护党的統一。經过反右派斗爭，清除了一批隐藏在党內的阶級敌人，純潔了党的組織，巩固了党的团結。但是，由于党員数量日益增多，出身不同，經历不同，水平不齐，差異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們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年年要講团結，月月要講团結，而且每天每时要講团結"。必須加强党的生活，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断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团結在党中央的周圍，統一認識、統一意志，勤勤恳恳地为党为共产主义事業，做好工作。3、加强共产主义教育，首先是要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特別是毛澤东思想。因为，毛澤东思想，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典范，是指导中国無产阶級革命胜利的总結，又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設的行动綱領，是現实政策，又是高度理論，是活的唯物辯証法。現在党內学習理論的空气仍然不高，特別是对于毛澤东思想，重視鑽研不够，不少同志对新鮮事物感覚迟鈍，缺乏預見性，就是由于学習太差。这种狀況，如果不下决心改变，要繼續做好工作是不可能的。只有对毛澤东思想刻苦鑽研，确实領会其精神实質，才能眞正跟好、学好、做好，把思想提高到共产主义水平。

注：孙作宾原任青海省委書記、省長，潘[illegible]丽原任青海省河南县委第一書記，刘杰原任青海省妇联主任，高[illegible]先原任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編者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議关于开除党内右派分子陈再励、王夢周、廖原、駱明、王浩、廖联原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屆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議，通过大鳴大放大字报的方法，开展了党內兩条道路的斗爭，徹底地揭發和批判了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長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王夢周，省委委員、省委財貿部長廖原，省委委員、省委宣傳部長駱明，省委委員、省委文教部長王浩，省委候补委員、自治区兵役局長廖联原等人在內的右派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惡活动。代表大会一致認为，这一斗爭的胜利，对于在全区范圍內进一步深入开展兩条道路的斗爭，純潔党的組織，巩固党的团結和統一，增强党的战斗力，从而有力地貫徹执行党的“八大”二次会議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推动我区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全面大躍进，有着極其重大的意义。

从大会以及大会之前所揭發出的材料說明，这一右派集团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已經延續了一年之久。从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共广西省第一屆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开始，他們就打着“反冒进”“反主观”的旗号，極力詆毁农業合作化和农業生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領导，进行破坏党的团結的活动，到一九五七年六月，中央宣布处理广西因災餓死人事件时，他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發展到了最高峯。在党內檢查因災餓死人事件的会議上，他們直接違反了中央对这一事件的正确結論，横

生枝节，借題發揮，硬把因災餓死人事件說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統購統銷政策所帶来的惡果，並进而全盤否定广西的工作，認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綫錯誤”，要求“重新估計农村工作”，要求省委“肯定錯誤”。

这一右派集团集中攻击的首要目标，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的农業合作化高潮和伴随而来的农業生产高潮。他們根本否定我区广大农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迅速实現社会主义农業合作化这一偉大的历史行动，把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極性說成是“强迫出来的”，“农業合作化太快了”。他們竭力攻击合作社“只顧集体，不顧个人”，要求無限制地發展社員家庭副業，借以瓦解合作社的集体生产。他們否認合作化的优越性，把合作社的生产說成一团糟。对一切足以說明农業生产成績的材料数字，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律認为是“吹牛”，“虛夸”，“是报喜不报憂”的表現。事实很明显，他們不遺余力地攻击农業合作化的目的，就是企圖扭轉历史的車輪，使全区农民群众从社会主义道路退回到資本主义道路上去。

在党中央的正确領导下，省委是始終貫徹执行党中央所規定的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綫的，並且同他們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斗爭。当他們看到，把自己的右派意志强加于党的企圖沒有能够实現时，就竭力地攻击党的領导。他們不惜採取極其卑鄙的兩面派的手法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由于党委不接受他們的反动观点，並且对他們的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斗爭，他們就歪曲党內生活的眞相，大肆攻击“党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党內沒有民主”，“書記一手遮天”。省委貫徹执行中央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方針，被他們攻击为“教条主义”，“好大喜功”！，“不从实际出發”。他們为了削弱和擺脫党的領导，就極力鼓吹分散主义，反对党对政府工作的領导，抗拒党对各部門工作的統一領导，說党的領导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只听塊

地，不听条条”。特别恶劣的是，他們还进行許多非組織的活动，到处散布流言蜚語，汚蔑坚持正确路綫的同志，丑化党的領导，企圖使党陷于分裂和癱痪的狀态，使党变成某种爭論不休的俱乐部。

这个右派集团，特别是廖联原，还極力地鼓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他無中生有地汚蔑省委存有“宗派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把解放初期，党为了純潔革命队伍而对地下党和游击队所进行的整頓工作，誣蔑成为对地方幹部和民族幹部的“打击、排斥和刁难”。根据所揭發材料，廖联原在去年曾經借着下乡視察的机会，捏造事实，敌我不分，替一些被清除出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和阶級異己分子喊冤；並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进行欺騙煽动，企圖挑撥群众对党不滿。这个右派集团的首領陈再励，也利用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緒，来攻击党委不重視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抹杀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偉大成就，誣蔑桂西僮族自治州是“形式主义”，企圖挑撥民族关系，分裂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結。

这个党內右派集团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事实上起了互相呼应的作用。他們也承認，他們的言論就是在詞句上也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样。在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瘋狂进攻的时候，他們都在或明或暗地大加喝采。在去年五月省委召开宣傳会議时，作为会議直接領导人的駱明和王浩，竟然严重歪曲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报告，否認兩条道路斗爭的存在，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內部矛盾的界限，極力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並且把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称做“宝貴的意見”。事实說明，他們早已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道，唱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一調子了。

由于这个右派集团的分裂活动在一个相当長的时期內，使省委的集体領导陷入了極度的困难，使党的正确路綫受到了極大的障碍，使广大的基層幹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極性受到了沉重的

打击，並且一度造成了幹部思想上的混乱，助長了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傾向，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給全区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社会主义建設所出現的低潮，就正是这股妖風直接造成的惡果。

陈再励、王夢周、廖原、駱明、王浩、廖联原所以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我們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內，“無产阶級同資产阶級的斗爭，社会主义道路同資本主义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国內部的主要矛盾。”这种斗爭不能不在党內反映出来。这个右派集团的成員，虽然很早就在組織上入了党，但他們在思想上並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們的資产阶級立場並沒有得到改造；加上他們都有着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然就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在党內的代理人，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里必須指出的是，当这些人犯了这样不可饒恕的錯誤和進行了这样的罪惡活动之后，党仍然沒有放棄对他們耐心教育和進行挽救工作，希望他們能够徹底醒悟，痛改前非。在去年六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議期間以及会議之后，党曾和他們進行了多次的个別談話，促其悔悟，但被他們拒絕了。在十二月省四級幹部会議上，党总結了过去一年来党內外兩条道路斗爭的經驗，对他們过去的罪惡言行，做了沒有指名的严厉批判，目的也在促使他們能够主动進行檢查，但他們仍然無动于衷，反而对党的批評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緒。党是無可再忍了，于是在今年二月間的省委全会上，向他們展开了斗爭。由上可見，这些人的反动立場，是極其頑固不化的。

代表大会經过討論以后，一致决議：开除陈再励、王夢周、廖原、駱明、王浩、廖联原的党籍；撤消他們党內的一切职务；並且建議有关行政方面撤消他們在行政工作方面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在党內外公布这个决議。

代表大会一致認为，清除以陈再励有首的右派集团，是广西党內兩条道路斗爭的一次重大胜利。为了巩固全区党組織在党中央領导下的团結和統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全区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員，必須認眞接受以下的經驗教訓：

第一、必須在党內外繼續深入开展兩条道路的斗爭，把整風运动进行到底，提高全体党員和幹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無产阶級的立場。在进行兩条道路斗爭时，必須严格区别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的兩条道路的斗爭，必須严格遵照团結——批評——团結这一公式去进行；屬于敌我之間的兩条道路的斗爭，如对右派分子，則必須加以無情的揭發和孤立，並应把党內的右派分子清除出党。

第二，全体党員必須認眞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学習毛澤东同志的著作，提高政治理論水平和革命警惕性，学会識別風向，分清大是大非，敢于坚持眞理，旗帜鮮明，为眞理进行不屈不撓的战斗。

第三，必須坚持維护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結，加强党的領导，反对分散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民主，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同时必須在發揚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巩固党的組織，坚决执行党的統一領导原則。

全区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員，必須在这次斗爭所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团結一致，同心同德，提高思想，依靠群众，貫徹执行"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把全区的社会主义建設迅速向前推进。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关于开除孙殿才、梁大均等九人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徹底地揭發和批判了省委常委、副省長孙殿才，前副省長陈成义（已死），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梁大均，省人民委員会秘書長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長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長王新潮，銀川專員曹又参，交通厅副厅長林里，商業厅副厅長梁克忠，前文化局局長馬济川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

会議揭發的大量材料証明：孙殿才、梁大均与陈成义、陆为公、刘余生、王新潮、曹又参等同流合汚，結成了一个右派集团，以省人民委員会和銀川地区为据点，以地方主义为綱領，以实現个人野心为目的，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

孙殿才是这个集团的主帅，他对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惡毒攻击。陈成义說自己在政府工作是“傀儡”，孙殿才說他也有“同感”。他們共同攻击說省委“包办一切”，“管的眞寬，連芝麻、綠豆都要管”。說党委是“以党代政”，政府是“有政無令”。陈成义落选后，他說这是“宗派打击”。关于增加兩个副省長的人选，会上他們都同意，但会后却对省委一个常务委員（地方幹部）說：“某某人当副省長我們不同意，你应該当副省長”。在醞釀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划时，他主張將平涼專区划入自治区，当他的主張被党外人士質問得不能自圓其說时，便說“这

是省委决定。”事实上省委当时並未討論过这个問題，更無权决定这样的重大問題。当省委批評了他的这个錯誤之后，他又在一些回族同志面前說：“我因为对成立自治区太积極，主張把自治区划大，受到省委的打击”。但当中央决定給自治区調外地回民幹部时，他又与梁大均密謀，企圖多摆当地汉民幹部，“頂住”外来回民幹部，使之不能到自治区工作。他反对羊群入社，为地主富农叫喊。他在視察銀川吳忠途中，到处指責下边羊群入社搞得太快了，折价太低了，自留量太少了，分紅比例太低了。並命令县区党委給有些地主富农退回一些羊子。他主張“三百只以下自留百分之五，三百只以上自留百分之十，三、四十只以下不入社”。“不論大小，平均折价綿羊每只十二元，山羊每只八元”（高于当时折价一倍多），当省委否决了他的意見，另提出一个指示草稿要他們在省人民委員会討論下达时，他和陈成义与党外人士扭在一起，四次不予通过。党外人士說这簡直是“二次土改”，他便說这是“一步登天”。他視察工作时只听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反映，代表那些人誣蔑农業合作化后“今不如昔”，“社員沒錢买油、鹽、洋火，几家子点一盞灯”，“拉双輪双鏵犂，把妇女們的身体搞坏了”。“銀川种了六万亩棉花，百分之九十沒有希望”。推广“京祖一〇七（水稻良种）連种籽也收不回”，“复种的庄稼都沒結好”。他还对統購統銷、价格政策和稅收政策等有一系列的反社会主义主張。他的生活腐化、道德敗坏。这次他估計到自己問題严重，过不了关，便与梁大均密謀破坏党代表大会，拍着口袋說：“我这里有一口袋材料，我要过不了关，我便亲自写大字报，現在有許多人对省委不滿，不敢講。我要一連出他几十張大字报，我的大字报一出，你再看这个热鬧。”

梁大均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員之一。一九五六年秋季以后，特别是醞釀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期間，与孙殿才一起，进行陰謀活动，反对省委，分裂党的团結。誣蔑省委是“讒臣当道”。挑

撥省委同志之間的关系，說省委委員某些人是紅人，某些人不在話下，某些人自顧不暇，某些人是挨整的。說批判“甘肃落后論”是某某人反对某某人。醞釀自治区区划时，他私自增加人选和首府兩个項目，要各县討論，进行“民意測驗”，制造輿論，抬高自己。並声称自治区首府如不設在銀川，銀川將退出自治区。他保护資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罵粮食幹部是“不顧眉眼为国家积累”，諷刺国家税收政策应該“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他同情私商誣蔑我們“比馬鴻逵刮得还厉害”。他对于單幹戶的所謂八大自由，不但不批判，反而認为省委提出批判是給“幹部潑冷水”。他号召群众做生意、跑运輸，在他的“社开大片（荒地）、队开中片、社員开小片”和“膠輪小車拴一輛，掙下錢来归自己”的口号鼓舞下，資本主义一度在銀川自由泛濫，致使一九五七年全区三十二万亩地未种或荒蕪了。梁大均也是生活腐化，道德敗坏。他也知道自己問題严重，难于过关，便向自治区工委負責同志要求，不参加党代会，与孙殿才密謀“搗乱”党代会，会前在銀川地委进行非法活动，並裝病十多天不到会。

陆为公是这个集团的成員之一。他在省人民委員会与孙殿才、陈成义一起以政抵党，說“省委管的太多了”，認为省委領导政府是“干涉”，他在政府是“有职無权”。他反对合作化，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工作成績，他說，“說一团糟的有的有根据，有的随声附和”，“單純的任务观点，加上不純的动机，就把事情办坏了”，“把十二年任务想在一朝完成”，“牲口死了这样多，原因何在”，“五百多万亩水地，是六百条人命换的”（实际死了一百多人）。他認为，“官僚主义大部分在上边，越上越多”，党的領导“总是喜欢听好的”。他反对文字改革說“改得不三不四，不象样子，现在聖人太多了。”說“拉丁化以后，聚奸不分，教育厅長聚（奸）女中校長，就会鬧笑話。”他反对批判“甘肃落后論”、散布地方主义，說“甘肃本来就是一个落后的省份，在历史上就是受外省人統治的”。

刘余生是这个集团的成員之一。他积極主張“甘人治甘”，排斥外来幹部。自封他是“甘南民变的領袖”，是“甘肃第一个拿起槍杆的人”。說“外省人不了解本地情况，当領导人不合适”。誣蔑外来老幹部說“古瓷古画还可以当古董，作摆設用，光憑老資格，有什么用处？地方幹部生長不起来，就是被一些老資格压住了。”党給民政厅派幹部时，他首先問“是不是甘肃人？幹部要地方化，外省的不要”。陈成义落选，他認为是“人身攻击”，他說陈成义“总是从甘肃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远利益上想問題的”。他常常玩弄兩面手法，在幹部中播弄是非，挑撥离間，对逢迎他的人，封官許願，提职增薪，对批評他的人，想尽办法，打击排斥。在反右派斗爭中，說“反对我，就是反对党”。把給他貼大字报的同志，說成“反党联盟”，把支部彙报說成“秘密会議”，並追問誰是后台老板。他認为民政厅整風是“外来人整地方人”。他說“棉布供应有問題，很多人劳动一天，回来沒被子盖”，“粮食統購太死了，只留一些口粮，連种籽都不留”，又說“农民生活太苦了，工人生活好，工人、农民生活相差太远”。

王新潮是这个集团的成員之一。他与孙作宾共同撰写甘肃地方主义綱領——孙作宾一九五二年“关于甘肃民族統战問題的报告”。右派分子說“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中間有溝和墻，这是白眼窩的人（小丑）造成的”。他即說“这样的人不仅党外有而且党內也有”。右派分子說“共产党打墻，共产党在墻內，民主党派在墻外，积極分子騎在墻头上”，他贊揚說“講的很好”，在大鳴大放期間，他希望組織劳改釋放犯和反革命分子家屬参加鳴放，他把一些五方面敌人吸收为民盟盟員。在反右派时，他說民盟只出現了一些右派言論，沒有右派分子。他还在“甘肃盟訊”上發表文章提出“採取更积極更有效的办法，放手發展組織”，並批判“盟內有些同志要求过高过严，束手束脚”。他否定統战工作成績，攻击党的領导說，肃反后民主人士来統战部的少了，

过去对民主人士思想改造“过火了”，民主人士感到統战部是“冷冰冰的”，因而是“敬而远之”，“要求多統少战”。他对陈成义的落选，表示不滿。对党处理严重違法乱紀的地方幹部張友三，認为是打击、排斥。他在自治区区划問題上玩弄兩面手法。

曹又参也是这个集团的成員之一。他积極支持孙殿才反社会主义的綱領。由于积極支持孙、梁的右派活动，梁大均称贊为“好外交家”。他有意压低銀川專区粮食产量，抗拒負担和統購任务，說“一九五六年生产任务訂冒了，負担重了”。他說“我們的各項工作都冒了，合作社办的太大，超越了历史界綫。开荒、植棉和造林任务都是冒进的，技术改革搞坏了。这都是領导上腦子發热以風为准造成的”。他反对肃反运动，說“肃反运动搞糟了，斗爭面太寬，搞的过火了”。党外右派分子反对党的文教政策和肃反工作，他贊揚說“你講的好，將文字加一下工，送到报社去刊登。知識分子已經改造好了，共产党还缺少一課——不懂業务”。

这次会議上，除揭露了孙、陈、梁右派反党集团以外，还揭露出右派分子林里，阶級異己分子梁克忠和頹廢墮落、違法失职、反党反領导的投机分子馬济川。

梁克忠是一个以欺騙手法混入党內，地主阶級本性未改的阶級異己分子。他身为商業厅副厅長，却極力攻击党对私商的限制改造政策。反对民主評議稅款，反对飲食業定質定量定价，反对国营公司控制貨源供应，反对限制自由市場。他誣蔑“私改工作一場糊塗”，他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謬論，同情私商裝穷叫苦，亲自給私商發放救济款，搭配热貨，多方照顧；並鼓动私商控告国营公司，因而私商称他为“梁青天”。他攻击社会主义商業，說国营公司职工加班加点“和資本主义剝削职工剩余劳动一样”。他一貫播弄是非，搞宗派活动。他把省委領导幹部划分为陝北派、晋綏派、庆陽派，並誣蔑省委排挤打击晋綏幹部。

誣蔑省委提拔某某是"朝里有人好坐官"，某人当省委書記是憑地方幹部，某人当副省長是憑民族幹部，提某人是因为"書記看得起"。又常在部長面前說厅長是宗派主义，在厅長面前說部長是主观主义。

他在商業厅組織小宗派，打击别的副厅長和科長，把持总支、支部、人事科，破坏党的德才兼备的幹部政策和建党的阶級路綫。称贊一些政治历史不清的分子"文化高、業务能力强"，是"好苗苗"、"台柱子"，給他們封官許願，提职提級，硬要把这些人拉入党內，並縱容包庇他們貪污、套購、走私等。他厭惡老幹部，駡他們是"老頑固"、"老狗当道"，要他們"滕板櫈"，鼓动青年"向老家伙开火"。他支持右派言論，包庇右派分子李韞章、張汝云等。他在大会期間，仍誣賴別人，向党反扑。

林里也是一个右派分子。他在政治上藏垢納汚，变成了反革命的保鏢人。他在交通厅大量提拔、任用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几年来，他提拔了二十八个有政治問題的人，其中有十九个反革命分子。在肃反运动中，他利用职权，極力包庇这些反革命分子，以"留用人員，經过民主改革，已作了交代"、"历史罪惡已处理"等作借口，为他們开脫。他極力主張从輕处理已查出的十二个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他攻击肃反运动，夸大运动的缺点錯誤，抹煞运动的成績。在鳴放阶段，他以推举中心發言人"代表鳴放"，"大字报底稿要审查"，"要用眞名实姓"，鳴放第二天就提倡爭鳴、反駁等手法阻撓鳴放。在反右派斗爭中，总說右派排的多了，百分比大了。他不但不去挖掘右派，領导斗爭，反而七十四天关起門为自己所受的处分写申訴書。他借口整風業务两不誤，在反右派斗爭最紧張的三个月里，先后召开了五次共三十八天大型業务会議，有意用这种办法挤掉反右派斗爭。因此該厅虽有四十多个右派分子，但三个多月时間只定了三个，而且把不少右派分子划为左派，有的还担任了战斗小組長和整改副組

長。斗爭極右分子楊子恒时他有意压抑群众斗志，使斗爭軟弱無力，迟迟不得开展。

馬济川是一个只圖享受、做官不做事，違法乱紀、頹廢墮落的投机分子。审幹时一直拒絕向党写自傳；在他三进兩出党的关键上，不肯提出証明人。他对中央、省委的許多指示和决議不学習，不傳达，不貫徹执行，仅一次檢查即發現把四十二份电报积压九个月，並丢了五份。他拒絕省委对文化系統工作进行檢查。他不但不保証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針，而且放任"一鳴惊人"、"一本書主义"、"关門提高，爭取成名成家"等資产阶級思想在文化艺术系統自由泛濫，他硬說"甘肃文化艺术系統沒有丁玲、陈企霞問題"，"不要硬搞"，"不然会毁灭幹部的"。他在文化系統私下封官許願、拉拉扯扯，培植个人勢力，造成文化局幹部队伍的严重不純。

他严重失职，腐化墮落，打人罵人，貪污浪費（借用公款六百八十多元，擅自在事業費內作了报銷）。在这次大会上，对于同志們的批判滿不在乎，不仅沒有悔改的表現，而且沒有檢查的誠意。

鑒于这些人已經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变成了党和人民的敌人，因此大会一致决議：把右派集团分子孙殿才、梁大均、陆为公、刘余生、王新潮、曹又参，右派分子林里和阶級異己分子梁克忠，投机分子馬济川清除出党，撤銷他們党內一切职务，向党內外公布，並且建議有关方面撤銷他們的行政和其他职务。

代表大会指出：陈成义对党是有罪的，他幹了許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本应組織上給以严厉处分，但鑒于他已經死了，因此，决議只在党內外公布他的罪惡事实，进行批判，不再作組織处理。

我們和孙、陈、梁右派集团之間的激烈斗爭，是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爭在党內的反映。

这次大会徹底粉碎了孙、陈、梁右派集团，使党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取得了一个大胜利，这个胜利將加速社会主义事業在甘肃的胜利發展。党內出現孙、陈、梁右派集团，这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我們揭發和粉碎了这个集团，解决了这个矛盾，並使全党受到了生动的教育，便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由于这个右派集团的主要分子都有較長的革命历史，担任着党政机关的重要职务，旣可以利用职权公开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又可以利用地方主义網罗人、煽动人进行反党活动。因此，对党的危害就特別严重，而揪出这伙暗藏的敌人，意义就特别重大。从这个斗爭中，我們应該得到一个严重教訓："發亮的並不都是金子"，必須經常提高革命警惕性。要时常牢記毛主席的教导："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鑒別其好坏，然后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

"党的团結和統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經常維护党的團結，巩固党的統一，是每一个党員的神聖职責"。这次大会上，揭發和清除了孙、陈、梁右派集团和其他反党分子，这是我們巩固党的团結、維护党的統一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地方主义在甘肃的影响还是广泛而深远的，个人主义思想在某些幹部中、党員中也是严重的。因此，繼續开展反对地方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的斗爭，就是当前巩固党的团結和統一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反对地方主义时，必須把利用地方主义来进行反党活动的人，和受地方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应該看到：坚持地方主义立場进行反党活动的，只是極少数的人，而大量的則是政治覚悟不高，有地方主义情緒，因而不自覚地犯了一些錯誤，这些人經过党的教育，一般的很快就可以改正的。还应該指出：地方幹部对于地方的热爱，幹部之間的友誼來往，党員及时向党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和各地区的特点，对工作中某些問題提出不同意見，这些都是党內生活中的正常現象，是不应該反对的。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議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楊效椿、李銳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通过）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議，徹底揭露了李世农（省委書記处書記、副省長）、楊效椿（省委委員、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檢察長）、李銳（省委委員、省副檢察長）、陈仁剛（原省司法厅党組書記、副厅長，已开除党籍，撤銷职务）等人的反党集団，粉碎了他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这是我們党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对于純潔党的組織，巩固党的团結和統一，巩固人民民主專政，促进社会主义事業的發展，有極为重大的意义。

这个反党集团的罪行是極为严重的。長期以来，他們陰謀破坏人民民主專政，危害党的組織，反对党的方針、政策。当去年五月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瘋狂进攻的时候，他們的反党活动达到了最高峰。

根据会議揭發：李世农是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腦，他伙同他的爪牙，利用职权，寬縱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为了遂行其寬縱反、坏分子的罪行，他篡改了党的肃反方針和政策，把鎮压与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改变成为只要寬大，不要鎮压；把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方針，改变成为有反不肃、無錯也糾。他还經常散布取消肃反斗爭、为反革命开脫罪責的謬論，說什么“殘余反革命保險一个也找不到”、“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性愈来愈弱了”、“反革命分子有兩面性”、“反革命分子在我机关多做一年工

作，等于多贖一年罪”。他甚至亲手制定一些該判不判、重罪輕判的案例，令各地仿行。据初步統計，經过李世农罪恶指导，全省放掉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达二千余名之多。由于李世农一貫罪恶活动的結果，使不少幹部受到了毒害，使政法部門产生了普遍而又严重的右傾傾向。

一九五七年初，省委鑒于政法部門右傾思想严重，决定展开批判。当时李世农採取兩面手法，在省委会議上不表示意見，背后却指揮他的爪牙陈仁剛、杨效椿、李鋭等有計划地到各地“查錯反左”，搜集反党材料，並通过檢察系統在全省普遍登記党委建議处理的所謂錯案，寻找岔子，煽动政法幹部反对省委的反右傾决定，向党發动猖狂进攻。他們明目張胆地誣蔑省委提出反右傾之后，下面“搞得很糟”，不許政法部門將省委反右傾指示下达，号召政法幹部要“坚持原則，不要怕摘掉烏紗帽”。去年大放大鳴期間，他們的反党气燄更为囂張。李世农在全省政法会議上，公然攻击省委的反右傾方針，否定反右成績，他叫囂：“反右發生了偏差，省委要負主要責任”，講反右成績是主要的，这是个“老公式”。公开挑撥政法幹部与党委的关系，煽动政法幹部与党委对抗，他把各級党委对某些政法幹部右傾思想的正确批評，說成是“党委过分責备政法幹部”，他誣蔑党委搞錯了案件，並要党委向政法幹部“承認錯誤”。他为了遂行其反党活动，还散播了“合作化后，已經沒有兩条道路斗爭”，現在經济基础已經改变，今后斗爭只是“新旧思想的斗爭”，資产阶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自己阶級的志願”等等反动謬論，企圖以此取消阶級斗爭，取消無产阶級專政。

不仅如此，李世农还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一貫違抗中央的方針政策，破坏党的統一領导。在土地改革时期，他庇护地主阶級利益；在合作化时期，他坚持資本主义道路；在生产和救災方面，他反对生产改革和生产自救的正确措施；在建党工作和幹部工作方面，他歪曲建党原則，破坏党的純潔，为反、坏分子大开

方便之門；他篡改党的审幹原則，寬縱叛徒和自首分子，把这些人的审查結論中的严重政治情节刪去，甚至將“对党不忠实”改为“对党忠实”；他一貫包庇坏人坏事，对一些严重違法乱紀分子，百般掩盖，多方照顧。他蓄意破坏党的統一，誹謗省委領导同志，煽动幹部反对省委，陰謀篡夺省委領导；他培植个人势力，实行派別性的幹部政策，拉攏落后分子，凡对党不滿的人，他都同情和支持。

李世农为着施展他的反党陰謀，还运用了剝削阶級的那套权术，一貫採取兩面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打击別人，抬高自己，甚至以“模范党員”自封。他長期隐瞞党对他的处分，吹嘘自己“德有余而才不足”。而且伪裝朴素，假冒忠厚，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十足的克己奉公的正人君子。他就是这样来騙取組織、騙取群众信任的。

楊效椿、李銳是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兩員主將。他們長期相互勾結，相互包庇，相互捧場。除上面已說到的那些事实之外，会議还揭發了楊效椿、李銳的許多罪行。

楊效椿亲手寬縱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一百余名，錯誤地釋放了大批被劳动教养的人，並且誣蔑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是“犯了扩大化的錯誤”。他包庇右派分子，甚至公然提拔已經暴露的右派分子，扩充其反党势力。

李銳長期隐瞞惡霸地主的家庭情況，解放后，又極力包庇負有血債的几个惡霸哥哥，並給他們安插工作；他还將不少反、坏分子引进国家机关，甚至对明显的右派分子加以提拔。他常常借口“人民內部問題”、“犯罪未遂”、“后果不严重”等等，拒絕批准逮捕和起訴，为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开脫罪責，並亲手寬縱了三十余名罪犯。他一貫抗拒省委决定，把省檢察院变成独立王国，並竭力煽动檢察幹部反对党的領导和监督。他陰謀改变国家檢察机关的性質，甚至公然宣称檢察机关是保护犯人的。

会議一致指出：以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陰謀活动，並不

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李世农、李銳都出身于地主家庭，虽然党对他們进行了長期教育，但他們一直拒絕改造，他們的剝削阶級本質，毫無改变。李世农在土改时曾說：家庭被划为富农（实际是地主），土地沒收，思想为之一动，李銳在反匪反霸中，曾为悪霸家庭受到清算而痛哭流涕。这就是他們那种剝削阶級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在民主革命时期，李世农、李銳虽然百般伪裝，混过了关，但就在那个时候，他們的反动本質，亦有所表現。李世农在抗日战爭初期，把党所組織的武裝送給了封建势力。在解放战爭中，他在淮南工作时，又退却逃跑。李銳也和李世农一样，犯过逃跑主义的錯誤，他曾在战爭紧急关头，放棄自己負責的工作地区。楊效椿系富农家庭出身，入党后，由于沒有得到徹底改造，存在着資产阶級的極端个人主义，当个人欲望沒有得到滿足时，就由对党不滿，仇恨党，与党对立，終于蛻化变質，走上反党道路。正是由于他們有的坚持反动立場，有的蛻化变質，所以他們就很自然地勾結起来，組成反党集团。当着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發展、阶級斗爭激化的紧要关头，他們的反党活动就更加露骨，更加囂張，他們的反动面目也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去年春天大鳴大放期間，資产阶級右派不甘心于剝削制度的死亡，向党發动瘋狂进攻，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同时在国际上，由于帝国主义利用匈牙利事件掀起了反共高潮，修正主义思潮一度猖獗，他們竭力攻击無产阶級專政、攻击党的領导、誹謗馬列主义。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情况下，李世农反党集团从他們的剝削阶級立場出發，利用党外右派分子进攻的声势，借助于修正主义的讕言，就向党进行了有組織有計划的更为悪毒的进攻。所以，这一反党集团的形成，以及他們的反党活动在去年五月达到了高峰，是不足为奇的。这是他們坚持剝削阶級立場的必然結果，这是国际国内尖銳的阶級斗爭在党內的反映。他們的反党活动是資产阶級右派对党进攻的一个組成部分。历史無情地証明了：他們完全是一

伙長期隐藏在党內的陰險的阶級異己分子和蜕化变質分子。

当李世农、楊效椿、李銳的反党陰謀尚未暴露之前，党曾对他們的錯誤，特别是对李世农、楊效椿的錯誤进行过多次教育的。对李世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犯的肃反扩大化的錯誤和在解放战爭中所犯的逃跑主义的錯誤，党就給予过批評和处分。在解放以后，对他在重大問題上态度曖昧，包庇坏人，矯揉造作，自封"模范"等錯誤，又一再进行了批評。特别当去年秋季發現他包庇右派分子陈仁剛和一些不正常現象以后，党又多次对他进行过尖銳的批判。对楊效椿的錯誤，在大会揭露以后，省委还力圖挽救他，省委負責同志曾亲自和他兩次談話，要他爱惜自己的历史，和李世农划清界綫，回到党的立場上来。尽管如此，但是他們一直抱着抗拒态度，毫無悔改之意，这就說明他們决心和党和人民对立到底。

会議一致認为：李世农、李銳和楊效椿是混入党內不堪改造的阶級異己分子和不可救葯的蜕化变質分子，是党內的右派。大会一致决議：开除李世农、楊效椿、李銳的党籍，撤銷他們党內的一切职务，並建議有关方面撤銷他們党外的一切职务。

会議一致指出：徹底粉碎以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安徽党組織內兩条道路斗爭的重大胜利。为了巩固全省党組織在党中央領导下的团結和統一，純潔党的組織，增强党的战斗力，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員应当从下列几个方面切实努力：

第一、革命嗅觉和警惕性必須提高。每个党員一定要坚决站稳無产阶級立場，加强政治責任心，提高革命警惕性，全心全力保衛我們的党，全心全力保衛人民民主專政。以保障社会主义事業的胜利。对于一切危害党、分裂党、破坏党的行为，对于一切破坏人民民主專政的罪惡活动，必須及时揭露，坚决进行不調和的斗爭，反对溫情主义、自由主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

第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必須严格遵守。每个党員一定要在集中指导下正确运用民主权利，充分發揚积極性、創造性，在党

的政治生活中勇于批評和發表意見，敢于爭辯和堅持真理。同时必須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遵守党的統一領导原則、維护党的团結，巩固党的紀律。任何問題，一經党的組織作出決議，必須無条件执行，决不允許陽奉陰違，背后自搞一套。对于那种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無組織無紀律行为，必須进行坚决斗爭。任何党員，都必須受到党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严格监督。

第三、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須确立。每个党員一定要努力加强党性鍛煉，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培养大公無私，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貴品質。必須加强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强思想改造，坚决克服卑鄙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反对爭名誉、爭地位、爭待遇、斤斤計較个人得失；特別是那些出身于剝削阶級家庭的党員，更必須加强对自己的改造，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員。

第四、中央的方針政策必須坚决执行。每个党員一定要認真研究中央的方針政策，做到学深、学透、学全，不断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保証做好党的一切工作。任何时候，对于中央的方針政策，必須忠实执行，决不容許断章取义，决不容許擅自修改。对于那些歪曲、篡改和背离中央方針政策的行为，必須及时进行坚决的斗爭。

第五、馬列主义水平必須提高。每个党員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習，学習馬列主义，学習毛主席著作，学習唯物辯証法，学会認識事物發展的規律，不断提高政治理論水平，提高識別能力。只有正确地掌握無产阶級的思想武器，才能在工作中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毛病，才能有力駁斥修正主义讕調和各式各样反馬列主义的謬論，坚强地保衛馬列主义原則。

我們相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导下，在这次会議胜利的基础上，全省党員一定能够接受这一事件的深刻教訓，更紧密地团結起来，發揚革命朝气，团結广大人民，为促进和完成偉大的社会主义事業而努力奋斗。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議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魏心一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通过）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議徹底揭發和批判了省委委員、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魏心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並且一致認为魏心一已經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

会議揭發的大量事实証明：魏心一是省文联右派集团反党的策划人和指揮者，他和右派分子戴岳早已結成了反党联盟。省文联右派集团以林洛里“什么思想在領导‘江淮文学’編輯部”的批評文章（編者按：这是林洛里同志写的一篇批評“江淮文学”編輯部資产阶級思想作風的文章）作为反党由头，用修正主义的观点来曲解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作为反党的“理論”根据，把党的原則斗爭誣蔑为宗派斗爭，作为反党的策略手段，將所謂“先剃自己的小辮子，后抓別人的小辮子”作为反党的行动步驟，都是出之于魏心一的策划和指揮。魏心一在林洛里的批評文章發表之前，即暗中作了反党的布置，他指使戴岳作假檢查报告去蒙蔽省委，抵抗党对他們的正确批評。林洛里文章發表时，魏心一正在北京出席全国宣傳会議，他利用这个机会，一面向中央宣傳部謊报省文联情况，企圖騙取支持；一面电告戴岳，妄称“林洛里批評和中央宣傳会議精神不符”来煽动省文联右派集团的反党气焰。魏心一从北京回来后，又直接指揮和煽动他們在省委召集的宣傳和文教部門的会議上，一次又一次地向党猖狂进攻，而他本人在这些反党活动中則採取了兩面手法，会上一套，

会外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这个人面前一套，在那个人面前又一套，手段是極为陰險毒辣的，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極其严重的。在相当長的一段时間內，魏心一戴岳反党联盟窃据了安徽文艺界的領导职位，篡改了党的文艺方向，使党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刊物"江淮文学"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当魏心一的反党陰謀还未暴露以前，省委对他包庇右派分子戴岳的行为，曾多次批評，並責令其檢查和交代，他不仅一直拒不交代，反而变本加厉，要戴岳坚持反党立場。由此可見，魏心一是一个坚决与党对抗到底的右派分子。

魏心一是出身于小資产阶級家庭的知識分子，入党后長期拒絕改造，極端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断發展，終于滚入資产阶級右派的泥坑。他一貫把自己負責的部門和地区，看做是自己的独立王国。抗日战爭时期他在苏北鹽东县任县長时，就擅自槍杀了無辜的通訊員毛小根同志。一九五〇年他任六安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时，上級党报批評了他領导下的一个工作人員，他竟向各县、区發出通报，对上級党报进行攻击。一九五三年他任徽州地委書記时，違反党的方針，擅自决定砍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業社。他任省委文教部長后，独立王国的思想更加發展，他想把文教部門造成魏家天下。他不但反对省委文教部和宣傳部合併，甚至以辞职不幹，要挾組織。他在工作中常常不請示省委就擅自决定重大問題。对被領导的同志，他或則作威作福，以表示自己的無上权威；或則封官許願，拉拉扯扯，企圖培植个人势力。他領导的部門和工作，不許任何人批評和过問，如果未經他同意而批評他領导下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單位时，他都認为是对他的个人权威的侵犯，因而深怀不滿甚至視若讎仇。

会議認为魏心一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是極其严重的，一致决議，撤銷右派分子魏心一一切党內职务，开除其党籍，並建議有关方面撤銷他的一切党外职务。关于他擅杀通訊員毛小根同志問題，則提交司法机关徹查处理。

的，这是广泛深刻的阶級斗爭的反映。反党集团首脑之一郑敦，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入党后長期坚持其剝削阶級思想，在民族解放战爭和反封建斗爭中动搖消極，但却热衷于勾心斗角，爭权夺利，对党講价錢，离心离德。云南解放前他即怀着搶地盤，發展个人的野心，进行許多非法活动。解放后全省党的組織在中央領导下进行反对地方主义的斗爭中，郑敦以兩面派的手法，从事欺騙党和培养个人势力的活动。被省委察覚並且严格批評之后，表面上暫时收斂，內心却更加仇視党，並且繼續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反党活动。反党集团另一首腦王鏡如，是一个蛻化变質分子，入党以后長期不願自覚地改造自己，一直保持、珍惜甚至欣賞他的頑固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經常恬不知恥地宣揚他"从来沒有过个人主义"，"向来以抗上为荣"，目無組織，横行霸道。一九五五年底省委醞釀下届委員的选举中，郑敦怀着当省委書記的野心，王鏡如怀着当組織部長的野心，进行非法活动。当他們的个人慾望得不到滿足时，对党不滿更加發展，在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活动、共同的密謀策划下結成集团，在全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阶級斗爭剧烈尖銳，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濫的严重关头，利用了某些幹部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連續地向党發动惡毒的攻击。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就有兩次瘋狂的总攻。

第一次总攻針对着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县、市和省的党代表大会。他們一方面背着省委，違反省委"通过党代表大会，动員全党实現党的政治任务——总結合作化，反对右傾保守，鼓起幹劲，貫徹执行农業發展綱要四十条"的方針，鼓吹極端民主化，鼓吹各县党代表大会"中心是發揚民主"只字不談生产，用誣蔑、丑化的手段打击以外来幹部为主的土改以来長期斗爭中形成的領导核心，分裂党的团結，企圖按照他們的面目去改組县委。另一方面，他們在各县党代表大会已經制造了若干混乱思想之下，毒化省党代表大会的气氛，对省党代表大会实行突然襲击，进行非法活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員会
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議关于
开除右派分子郑敦、王鏡如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員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議，徹底揭露了以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郑敦和組織部副部長王鏡如为首的反党集团，批判了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这是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兩条道路斗爭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胜利对于純潔党的組織，巩固党的团結統一，提高党的战斗力，使全省党員更加紧密地团結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周圍，密切地联系群众，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事業，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个反党集团是一个有目的、有綱領、有組織的陰謀集团。他們一切陰謀活动的目的是篡夺党的領导，改变党的性質，为資产阶級复辟开辟道路。他們的綱領是宣揚資产阶級民主，修改党的全部原則，取消党的領导；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幹部政策；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建設大躍进。这个反党集团以郑敦、王鏡如为首，嘯聚着一批已經揭發的如臧野农（省委組織部組織指导处处長）、袁用之（省建筑工程局处長）等骨幹分子和一批党內右派分子、阶級異己分子、坏分子，有計划地向党举行进攻。

这个反党集团是在一九五六年初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形成

的，这是广泛深刻的阶級斗爭的反映。反党集团首腦之一郑敦，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入党后長期坚持其剝削阶級思想，在民族解放战爭和反封建斗爭中动摇消極，但却热衷于勾心斗角，爭权夺利，对党講价錢，离心离德。云南解放前他即怀着搶地盘，發展个人的野心，进行許多非法活动。解放后全省党的組織在中央領导下进行反对地方主义的斗爭中，郑敦以兩面派的手法，从事欺騙党和培养个人勢力的活动。被省委察覺並且严格批評之后，表面上暂时收歛，內心却更加仇視党，並且繼續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反党活动。反党集团另一首腦王鏡如，是一个蛻化变質分子，入党以后長期不願自覺地改造自己，一直保持、珍惜甚至欣賞他的頑固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經常恬不知耻地宣揚他"从来沒有过个人主义"，"向来以抗上为荣"，目無組織，横行霸道。一九五五年底省委醞釀下屆委員的选举中，郑敦怀着当省委書記的野心，王鏡如怀着当組織部長的野心，进行非法活动。当他們的个人慾望得不到滿足时，对党不滿更加發展，在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活动、共同的密謀策划下結成集团，在全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阶級斗爭剧烈尖銳，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濫的严重关头，利用了某些幹部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連續地向党發动惡毒的攻击。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就有兩次瘋狂的总攻。

第一次总攻針对着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县、市和省的党代表大会。他們一方面背着省委，違反省委"通过党代表大会，动員全党实現党的政治任务——总結合作化，反对右傾保守，鼓起幹劲，貫徹执行农業發展綱要四十条"的方針，鼓吹極端民主化，鼓吹各县党代表大会"中心是發揚民主"只字不談生产，用誣蔑、丑化的手段打击以外来幹部为主的土改以来長期斗爭中形成的領导核心，分裂党的团結，企圖按照他們的面目去改組县委。另一方面，他們在各县党代表大会已經制造了若干混乱思想之下，毒化省党代表大会的气氛，对省党代表大会实行突然襲击，进行非法活

动，散布流言蜚語，企圖操縱选举，以便从上面篡夺領导。在省委和各地、市、县委和大多数正直有覚悟的党員坚决維护党的团結的努力下，这次进攻虽然並未得逞，也确已造成党內一定时期的思想混乱。但他們並未甘心，省党代表大会后，他們以总結党代表大会为名，不理会省委的制止，發文件通报各地党的組織，以"不民主"和"反中央"的罪名繼續向省委进攻。

匈牙利事件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开始向党进攻，这个反党集团也就異常敏感地立即开始了他們对党的第二次总攻。他們到处搜罗和夸大农村的"陰暗面"，把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农村描画成"黑漆一团"，他們發动和支持党內外的不滿分子、坏分子以至反革命分子喊寃，叫屈，翻案。上自省委下到基層，他們辱罵党是"特殊化"、"特权集团"，以至煽动学生和幹部上大街打倒"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这次进攻的頂点是他們發动省委組織部的右派分子張貼攻击省委的反党大字报。

反右派斗爭开始以后，郑敦、王鏡如千方百計地进行阻撓和破坏，組織退却；为他們的骨幹分子和組織部內的右派分子开脫，或者說"組織部沒有右派"、"某某人不是右派"，或者以調下乡为名为他們回避、隐藏。郑敦被下放到县后，他与王鏡如之間还經常共同策划，分头执行，企圖保存实力。

从一九五四年以来，省委对郑敦、王鏡如这兩个野心家的陰謀活动从未放松过警惕，曾經和他們进行过無数次的斗爭，对他們提出过严重的警告，並且無数次地企圖使他們悔改轉变，直到最后揭露斗爭之前，还不放松这种努力。但他們从資产阶級的本能出發，利令智昏，坚持反党到底。每遇到一次打击，他們的兩面派手法就更加隐蔽和陰險。在党的組織和会議面前，他們把自己的眞正面貌掩盖起来，把自己裝飾做党的路綫的拥护者，背着省委，他們又欺騙下級，假借省委的名义，歪曲党的方針、原則，販卖与省委的决定完全針鋒相对的反党私貨。資产阶級右派的尾巴終究是不能長期掩盖得住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政治战綫和思想

战綫上的阶級斗爭尖銳起来的时期，社会上刮起了妖風，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势，与党內外右派分子一起向党發动了瘋狂的进攻，終于原形畢露。

(二)

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根据他們的反动綱領，从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

一、为了篡党，他們把党所委託他們管理的部門、事業和党的幹部霸为私产。他們控制省委組織部为基地，到处扩張势力，安設据点。自一九五三年起，郑敦即在省委組織部組織反党力量，打击排斥部內忠实于党的幹部。王鏡如加入反党集团后，二人即共同策划、狼狽为奸，收罗、拉攏或欺騙一批品質惡劣的分子以至坏分子、阶級異己分子，或者未經改造意志薄弱的幹部，培养私人势力；同时，更为狠毒地打击和排斥忠于党的幹部，特别是經过考驗的老幹部。組織部在肃反和整風运动中已經清查出来的四个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八个右派分子，几乎都是他們亲自培养提拔起来的亲信。他們依託这个陣地，与省委分庭抗礼，採取下乡巡視，派工作組試点，开業务会，訓練班，打电話，發通报等方式，歪曲省委的指示，販卖反党私貨，非法地越权發布与省委决定針鋒相对的指示，干涉各級党委的工作。他們利用組織部的有利地位，欺騙省委，在他們所可能鑽空子的地方安插重用亲信和可以被利用的分子。只是由于省委严格控制和不断警惕，不断打破了他們到处扎釘子的陰謀。他們頑强固守的基地，最后也不得不被粉碎。

二、他們从根本上反对党挑选幹部的德才兼备的政策，幹部团結的政策，“有經驗的老党員、老幹部和帶着新鮮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員、新幹部相互协力”（毛澤东选集卷二“共产党人”發刊詞）的政策。他們利用地方主义的遺留影响，惡毒地挑撥外来幹部与本地幹部的团結，挑撥新老幹部的团結，挑撥工农幹部与

知識分子幹部的团結。他們針对着我省地下斗爭时期建党路綫錯誤与和平起义所帶来的幹部成分复杂，有經驗的老幹部非常少，因而外来老幹部特别重要的特点，他們就特别着重打击、排斥陷害老幹部，在基層則極力排斥工农出身的基層幹部，辱駡老幹部“沒有文化，已經完成了历史任务”，应該“退休”、“进博物館”，要对老幹部实行“贖买”政策，甚至假审幹之机無中生有地中伤陷害若干主要領导幹部。这种毒辣的摧毀党的骨幹的陰謀，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断送党的命脈。党从来珍貴老幹部，因为他們是革命事業的保証；同时也珍貴經过斗爭鍛煉的新的工农幹部和經过改造的新的知識分子幹部，而且把培养大批新幹部作为自己的重大責任。但是，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吹捧一些未經改造的知識分子和有着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人“能說会写”、“有才能”，加以提拔重用，並且要他們摆开老骨幹的帶領和帮助，目的無非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反党势力。他們甚至不惜用封官許願、縱容煽动以至請客吃飯等卑鄙手段，收罗一些犯有严重錯誤毫無悔改、蛻化变質、对党不滿的分子，甚至異己分子和坏分子，扩充反党势力，以实現他們的政治野心。在某些場合，他們也曾利用某些人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幹部中进行非法活动。所有这些，充分暴露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幹部政策，实行着徹底的資产阶級个人野心家、陰謀家的幹部政策。

三、这个反党集团煽动極端民主化，从各个方面根本修改党的全部組織原則。他們反对党是無产阶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几年来一直鼓吹“部門分工”、“党政分工”、“党社分工”，要求党委部門应有决策权利，反对党委“包办”和“干涉”政府工作，反对支部“干涉”合作社的工作，非法通知規定乡人民委員会和合作社管理委員会中党員只应佔三分之一。一切陰謀在于企圖取消党的領导，把党变成資产阶級議会党团。他們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鼓吹“無限制的民主”、“不拘形式的發揚民主”，

目的是企圖在党內制造混乱，便于他們混水摸魚。他們反对集体領导与个人作用的統一，集中地反对各級党委第一書記的作用，捏造"書記十大罪狀"、"委員十大苦悶"，誣蔑書記"專断"、"不民主"、"是党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罪惡淵源"，目的在于削弱党委的領导核心，使党的各級組織陷于癱瘓，而便于野心家的篡夺。他們反对个人服从組織，少数服从多数，下級服从上級，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則，鼓吹下級"頂"上級、部門"頂"党委，鼓动部門向党委要"独立权力"，目的在于使部門各自成为独立王国，使党委成为資产阶級的行業公会。在他們的基地組織部內部，他們就是利用極端民主化使坚持原則忠实于党的幹部無可作为，使他們的党羽横行霸道；在他們所煽动的許多县、市的以及厂矿、学校的党代表大会上，这种邪惡的修正主义傾向曾使得这些党組織內發生一度的思想混乱。

四、这个反党集团和所有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一样，几年来坚持不懈地和党爭夺农村陣地，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地进攻党的农村組織，反对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当土改結束急需在农村建党，以便巩固土改的成果和立即領导农民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关头，他們对农村的建党工作实行怠工。农村支部普遍建立以后，省委适应当时的政治任务和組織狀况，提出改变农村組織形式和領导方式，加强支部的領导作用，逐步撤銷工作队，加强县委对支部的直接領导，培养支部的工作能力。他們却歪曲省委的方針，辱駡工作队和老幹部，誣蔑他們不懂党的組織原則，是"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老祖宗"，下令强調立即撤銷工作队，其目的在于割断以老幹部为核心的工作队与新建立起来的支部的联系，同时他們强調县級机关"正規化"，以反对"县委五个部門上了五把鎖"为名，反对县級机关深入基層領导生产合作。这都是为了便于他們按照資产阶級的面貌，去改造党的农村基層組織。一九五五年秋天，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布置了为肯定和發揚积極性迎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而整党。他們却把农村支部說成是黑漆

一团。誣蔑农村党員“普遍有退坡思想，划不清敌我界限，百分之四十至七十不想幹”，企圖以此来証明“农民不贊成社会主义”、“支部不能領导合作化运动”，反对社会主义高潮。一九五六年春，农村基本上完成合作化之后，他們又强調“党社分工”，要合作社实行“一長制”，要支部不抓生产，企圖使支部从根本上脫离群众，使合作社自生自灭以致解体。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和农村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向党进攻时期，他們配合右派分子的进攻把农村說成是黑漆一团，捏造“十大矛盾”、“十大紧張”，是社会主义改造太快的結果；他們还散布“無敌論”，歪曲說：农村的基本矛盾是基層幹部与群众的矛盾，也即是“党与群众的矛盾”，把农村支部誣蔑成一个脫离群众的特殊化的集团。因此，在右派猖狂进攻中他們堅持要整党，要反支部的特殊化，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地向党进攻，企圖把支部完全整垮。很明显他們知道农村战綫是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誰战胜誰的决战場，他們的目的是反对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大躍进，取消工农联盟，取消党对农村的領导，取消农村的人民民主專政，为資产阶級复辟开辟道路。

几年来，不論在会議上、在实际工作中，或个別談話中，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在对待农村問題上的陰謀，每次都被省委識破和严厉地駁斥，但是他們始終不甘心，頑强地一貫地堅持与省委对立。

五、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为了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們曾經違背省委肯定成績、保护与發揮幹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極性的方針，在农村叫囂反“冒进”，到处寻找和夸大黑暗面，以証明“合作化太快”，“合作社一团糟”，証明社会主义不能前进。惡毒地攻击一九五六年大姚县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提前实現“农業發展綱要（草案）”和三年基本上实現水利化的决議，为“盲目冒进”，为“强制通过”、“不民主”。直至今年大躍进中，他們还制止幹部和群众兴修水利、改水田，强令粮食退庫。

社会主义事業的罪惡活动，保衛党的团結，保衛人民民主專政，以保障社会主义事業的胜利。

第二、肃清一切修正主义傾向，反对資产阶級民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放手發动群众，充分發揚群众路綫的党的光荣傳統，發揚無产阶級的民主。必須充分揭發資产阶級“民主”的欺騙性和反动性，必須充分揭發“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于損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負不起斗爭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毛澤东选集卷一“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必須揭破：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資产阶級复辟服务的資产阶級民主，就是为巩固無产阶級專政、促进多快好省的建設社会主义的無产阶級民主。每个党員必須提高覺悟，提高識別能力，不要作資产阶級的“民主”、“自由”的花言巧語的俘虜。我們主張領导与群众相結合，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相結合，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报，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既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潑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無产阶級的民主，正是消灭了資产阶級民主的結果。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資产阶級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們必須發揚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以抵制任何修正主义傾向。

第三、地方主义是資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血兒，必須徹底肃清。解放后，地方主义曾經成为土地改革的阻碍力量。省委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綫，經过整党克服地方主义，从思想上团結了大多数，形成以外来幹部为主的領导核心，使土地改革得以順利完成，大多数地方幹部也得到提高。而且經过八年斗爭中联系群众，極大多数外来幹部也已經本地化，成为党在云南的革命事業的可靠支柱。但是由于过去的整党是在民主改革的条件下进行的，思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地方主义的遺留影响仍然存在，以致郑敦能够利用这个影响来作为反党的重要工具。全体党員应該从这次斗爭中吸取教訓，徹底肃清地方主义的遺留影响。

要在党內和群众中深入宣傳共产主义的原則，使每个人都認識地方主义是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民族主义、宗派主义都是資产阶級傾向，也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也必須加以批判。党的幹部政策的最高原則不是地方化，而首先是共产主义化。每个幹部都应該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覚悟，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一道建設社会主义。每个党員都应該积極維护党的領导核心，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

第四、必須克服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凡有个人主义而又不能自覚地进行斗爭的人，都念念不忘个人的名誉地位，向党伸手。当他們無止境的个人慾望得不到滿足的时候，就必然对党不滿，以至于一步一步地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每个党員都应該从与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作斗爭中吸取教訓，加强党性鍛煉，提高共产主义覚悟，加强自我思想改造，坚决克服一切爭名誉、爭地位、爭待遇，斤斤計較个人得失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培养大公無私、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貴品質。

最后，必須把“多快好省，鼓足幹劲，力爭上游”作为建設社会主义中照耀一切的灯塔。各級党的組織，每个幹部，每个党員都要把組織性与創造性，革命幹劲与深入的鑽劲結合起来，对組織要时刻老老实实，在工作上要永远生龙活虎，又紅又專，永远成为社会主义建設的革命派、促进派。对于来自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任何誣蔑和攻击，要敏銳地給以反击。对于同志中思想迷惑，消極畏縮，劲头不足，官气、暮气等等保守傾向，要坚持“团結——批評——团結”加以批判和克服，發揚积極性，正确地維护与坚持党的路綫。

省委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議完全相信：在揭露和粉碎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的胜利基础上，全省党員只要能够認眞地接受深刻的教育，提高覚悟，我們一定能够紧密地团結在完全可以

信賴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为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大躍进創造新的偉大的胜利。

中共河北省委第五次全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洪濤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通过）

中共河北省四級幹部会議和河北省委第一屆第五次全体会議，徹底揭發和批判了省委統战部長刘洪濤（省委常委）罪惡的反党活动。这是河北省党組織在社会主义道路同資本主义道路斗爭中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加强党的团結和統一，維护党的紀律，提高党的战斗力，有着極其重要的意义。

刘洪濤是一个極端自私自利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者。他的濃厚的个人名利欲望是永远不能滿足的，也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正因为如此，他就从卑鄙的名利观点出發，長期对党不滿，以致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党的道路。去年夏季，当資产阶級右派利用我党整風时机向党發动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以为实現他的个人野心的条件成熟了，便和党外的右派分子站在一起，里应外合，向党进行了惡毒攻击。特別是在去年八月省人代会反击右派分子王葆眞的斗爭中，他使用了資产阶級的各种卑鄙手段，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破坏省委的决議，破坏反右派的斗爭。身为省委常委、統战部長、省政协副主席的刘洪濤，就这样甘心充当了資产阶級右派在我們党內的代理人。

刘洪濤在去年大鳴大放期間和右派分子王葆眞結成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党联盟，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王葆眞在去年三月全国政协会議上，借水利問題向党和人民政府發动了攻击，否定党

和政府几年来水利工作的巨大成就，誣蔑党和政府"虚擲"水利經费，給河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災害。刘洪濤对这种顚倒黑白的讕言不但不憤恨、不駁斥，反而倍加讚揚，百般叫"好"，並在去年五月省政协会議期間，与王葆眞圖謀划策，結成联盟，企圖借口水利問題，混淆視听，迷惑群众，制造混乱，达到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目的。

当党和人民徹底揭露了右派分子王葆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並展开斗爭的时候，刘洪濤不仅不幡然悔悟、低头認罪，向党交代，反而加紧活动，千方百計地包庇右派分子王葆眞，掩盖他自己的反党罪行。在省人代会第六次会議期間，刘洪濤为了破坏大会对王葆眞的斗爭，隐瞞王的反动言行材料、多方为王进行辯解，煞費心机地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王葆眞粉飾裝璜成"好人"，坚决反对在大会上对王进行徹底批判。在人代会对右派分子王葆眞已展开斗爭后，刘洪濤竟借其省委統战部長的身份，使用威胁手段，玩弄兩面手法，阻止其他同志对王葆眞进行批判，妄圖挫伤人民代表对右派分子極端憤慨的斗爭情緒。

政治思想战綫上的革命浪潮是不可阻擋的，人民代表的斗爭意志是不能动搖的，右派分子的詭計是不可能得逞的。王葆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被戳穿了，右派分子的丑惡面目終于完全暴露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洪濤不仅沒有接受应得的教訓，幡然悔悟，放棄他的罪惡活动；相反的，却和王葆眞暗中勾結，訂立攻守同盟，企圖頑抗到底。並为王葆眞"申冤"，妄圖策动王葆眞翻案。

根据刘洪濤一連串的反党活动的事实，省委全会一致認为刘洪濤已經完全背叛了党，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右派在我們党內的代理人。刘洪濤所以由一个"老"党員，竟然墮落到这种地步，这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目前我們国家正处在政治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資本主义所有制已經基本上被消灭了，資产阶級作为一个阶級正

在被消灭中，而資产阶級分子也正在被改造着。但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級的斗爭並沒有結束和熄灭。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斗爭，还將存在一个很長的时期，而且这种斗爭不能不在党內反映出来。党內某些不坚定的分子，由于經不起資产阶級思想的腐蝕，不可免的要蛻化变質，走上反党的道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刘洪濤正是这样一个人。

党在当前历史时期思想战綫上的斗爭任务就是"兴無灭資"，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在現阶段的革命斗爭中更加反动、更加卑鄙了，它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須扫除的資本主义的上層建筑物。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是一些党員墮落为資产阶級右派的共同思想基础。刘洪濤的头腦里充滿了卑鄙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他長期背着"老資格"的包袱，驕傲自滿，不求进步，喜人奉迎，厭惡批評，並一再向党伸手要名利地位。在他担任了統战部部長的时候，向党要省委委員；当了省政协副主席，又要副省長；选举"八大"代表时，又伸手要"八大"代表。他对自己这种名利熏心的行为，不以为恥，反以为荣，竟称之为"毛遂自荐"。当他达不到个人目的时，就長期对党牢騷不滿，还把这种牢騷不滿叫做"不平則鳴"。由于他这种極端的个人主义欲望和他对于資产阶級的阿諛奉承特别感到兴趣和溫暖，对党就更加离心离德了，以致發展到坚决反党的地步。

党对刘洪濤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惡劣品質早有察覚，曾对他进行过多次教育。早在傳达貫徹党的七屆四中全会决議时，省委就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批評帮助；对他一再伸手向党要名誉地位和对党不滿的情緒，也进行过严肃的批評和警告。但是他無动于衷。在去年八月省人代会期間，省委發覚他的反党行为后，又一再对他进行教育，希望他站到党的方面来。他沒有听取党的劝告，却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人代大会后，省委徹底地揭發和批判了他的反党罪行，他仍然避重就輕，躲閃敷衍。直至今年一、二月間四級幹部大会对他展开了严肃地徹底地揭發批判，他

的蒙混过关的企圖被粉碎了，才被迫承認了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省委全会一致認为，刘洪濤已經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員的起碼条件，为了巩固和純潔党的組織，維护党的紀律，提高党的战斗力，决議开除刘洪濤的党籍，撤銷他在党內的一切职务，並建議有关方面撤銷他的行政职务。

省委全会强調指出：刘洪濤反党活动的被揭發是河北省党組織的一个重大胜利。刘洪濤进行了卑鄙的反党活动，这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是，我們粉碎了他的反党活动，並在斗爭中使党的組織受到了鍛煉和教育，这样，坏事也就变成了好事。全会要求全省党的組織和全体党員必須从刘洪濤的反党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訓，坚决做到：

一、必須加强党性鍛煉，同党內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爭，不断地提高共产主义的覚悟，保持共产党員的大公無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貴品質，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它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是絕对不相容的，和党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具有严重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决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为党的偉大事業进行忘我的斗爭，他們在政治上常常是不坚定的。微小的名利思想不加克服，就可能由小变大，以致在政治上完全墮落变質。因此，每个共产党員，都必須坚决反对爭个人的名誉、爭地位、爭待遇，随时和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爭；一定要保持兢兢業業、謙虛謹愼的优良作風；一定要發揚共产党員忘我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二、任何党員都必須無例外地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坚决执行党的决議，加强組織性紀律性。民主集中制是我們党的根本組織原則，它既保証全体党員的积極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發揮；又保証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統一。每一个党員都必須坚持原則，發揮独創精神，在党的統一領导下进行工作和斗爭。在問題

沒有作出決議之前，任何人都可以而且应該勇敢地自由地暢述己見；在作出決議之后，則必須無条件的执行，决不允許陽奉陰違，对于違反組織原則，破坏党的決議的行为，党的組織和党員必須坚决与其进行斗爭。

三、提高革命嗅覚和警惕性，坚决站穩工人阶級立場。每个共产党員，都必須認眞地学習馬列主义，学習毛主席的著作和党中央的政策，不斷地提高自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裝自己。同时，还要在复杂的阶級斗爭中切实鍛煉自己，作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勇往直前，不使自己迷失方向。一个共产党員必須善于識別香花毒草，能够坚决地抵制和反击資产阶級各色各祥的思想影响，經得住任何風浪的冲击，过好社会主义关，为偉大的共产主义事業奋斗到底。

中共河北省委第五次全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杜存訓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通过）

中共河北省四級幹部会議和省委第一屆第五次全体委員会会議，徹底揭發和批判了省工会联合会主席杜存訓（省委候补委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是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問題上一場兩条道路的严重斗爭。这一斗爭的胜利，对于純潔巩固党的組織，捍衛社会主义事業，肃清資产阶級右派对工人阶級的侵蝕，有重大意义。

从会議揭發的材料証明，杜存訓是一个隐藏在党內的右派分子，是工人阶級的叛徒，也是一个陰險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家。

杜存訓的反党罪惡活动是極为严重的。最惡毒的是他打着“維护工人阶級利益”的招牌，集中地攻击党对工人运动的領导，攻击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方針路綫，妄圖分裂党与工人阶級的关系，改变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党是工人阶級的先鋒队，是工人阶級的最高組織形式。正是在党的領导之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業才取得了偉大胜利，工人阶級的历史地位才發生了根本变化，工人运动在社会主义事業中才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杜存訓对党的領导和工人运动的成就極端仇視。他污蔑党不懂“社会主义国家职工运动的方針”，不懂“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的地位和作用”，攻击党“限制了工人运动的發展”。他别有用心地把党和工会組織分割对立起来，千方百計挑撥党和工会的关系，打击和破坏党在工人阶級中的政治影响。这就徹头徹尾暴露了杜存訓企圖篡改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的性質和作用，篡改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群众的紐帶的根本原則，企圖利用工会与党分庭抗礼，以实現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目的。

杜存訓反党罪行的另一突出表現，就是利用少数人的不合理要求和狹隘的經济利益，来破坏工人阶級社会主义事業的根本利益，並在工人阶級內部制造分裂。我們党是工人阶級和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党从来是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的，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始終从六亿人民出發，从社会主义总利益出發，来教育工人阶級，把工人的目前利益与远大利益結合起来。杜存訓則抓住“工人福利問題”，向党向工人阶級进行惡毒地攻击。他竭力破坏党关于合理調整职工工資福利的正确政策，用狹隘的經济主义与資本主义思想来腐蝕工人的阶級意識，把党污蔑成实現工人阶級利益的障碍，借以煽动和欺騙工人群众，把斗爭的矛头引向党。一九五七年夏季，与資产阶級右派的猖狂进攻紧相配合，杜存訓完全扮演了煽風点火，扩大矛盾，挑撥团結，制造混乱的罪惡角色，其目的就是要竭力煽动工人鬧事，利用工人鬧事来反对党，以实現其个人野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事業。

该勇敢地自由地暢述己
行，决不允許陽奉陰
行为，党的組織和党員

急工人阶級立場。每个
学習毛主席的著作和党
产主义水平，用馬克思
的阶級斗爭中切实鍛煉
前，不使自己迷失方
能够坚决地抵制和反
E何風浪的冲击，过好
到底。

次全会

党籍的决議

通过）

第五次全体委員会会
存訓（省委候补委
义工人运动問題上一
对于純潔巩固党的組
对工人阶級的侵蝕，

隐藏在党內的右派分
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

杜存訓的反党罪惡活动是極为严重的。最惡毒的是他
"維护工人阶級利益"的招牌，集中地攻击党对工人运动
导，攻击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方針路綫，妄圖分裂党与工
的关系，改变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党是工人阶級的
队，是工人阶級的最高組織形式。正是在党的領导之下，
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業才取得了偉大胜利，工人阶級的历
才發生了根本变化，工人运动在社会主义事業中才發揮了
作用。但是，杜存訓对党的領导和工人运动的成就極端仇
汚蔑党不懂"社会主义国家职工运动的方針"，不懂"社
国家工会的地位和作用"，攻击党"限制了工人运动的發
他别有用心地把党和工会組織分割对立起来，千方百計挑
工会的关系，打击和破坏党在工人阶級中的政治影响。这就
徹尾暴露了杜存訓企圖篡改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的性質和作用
改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群众的紐帶的根本原則，企圖利用工会
分庭抗礼，以实現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目的。

杜存訓反党罪行的另一突出表現，就是利用少数人的不
要求和狹隘的經济利益，来破坏工人阶級社会主义事業的根
益，並在工人阶級內部制造分裂。我們党是工人阶級和全国
最高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党从来是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的，
会主义建設中始終从六亿人民出發，从社会主义总利益出發
教育工人阶級，把工人的目前利益与远大利益結合起来。杜
則抓住"工人福利問題"，向党向工人阶級进行惡毒地攻击
竭力破坏党关于合理調整职工工資福利的正确政策，用狹隘
济主义与資本主义思想来腐蝕工人的阶級意識，把党汚蔑成
工人阶級利益的障碍，借以煽动和欺騙工人群众，把斗爭的矛
向党。一九五七年夏季，与資产阶級右派的猖狂进攻紧相配合
存訓完全扮演了煽風点火，扩大矛盾，挑撥团結，制造混乱
惡角色，其目的就是要竭力煽动工人鬧事，利用工人鬧事来
党，以实現其个人野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事業。

杜存訓同时还狂妄地攻击和詆毁人民政府，阻撓和抗拒政府法令的执行。他破坏政府威信，妄圖把工会凌駕于国家政权之上，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組織对工人阶級領导的政权的支柱作用。

杜存訓为实現其政治上的罪惡目的，在組織上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破坏党的活动。他不断無中生有、無事生非地制造党內糾紛，任意歪曲党的集体領导和个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組織原則，借以抵制和反对省委的領导。他背着省委在省工会內部多次制造所謂"反宗派"斗爭，打击敢于向他提不同意見的人，打击敢于向省委反映問題的人，並捏造、散布流言蜚語，攻击破坏党的領导。杜存訓企圖把省工会完全置于其个人統治之下，以便为所欲为地进行反党活动。

杜存訓为着施展其反党的罪惡陰謀，完全採用了剝削阶級的一套权术手段。他慣于制造矛盾，利用弱点，歪曲事实，借題發揮，借以打击別人，抬高自己。他經常採用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手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事实証明杜存訓是一个十足伪善的陰謀家。

全会認为，杜存訓墮落成为右派分子並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杜存訓是一个品質惡劣的極端个人主义者，他具有一套極其反动的資产阶級唯我主义世界观。多年以来，他完全以个人利害为中心，以卑鄙的資产阶級观点，观察处理党的生活和党內关系，用剝削阶級損人利己的手段对待党和同志。他一向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从不把党的領导看在眼里。他不是个人服从組織，而是要挾組織服从他个人，企圖以他个人的面貌来改造党。杜存訓热衷于个人权势，达不到个人目的，就仇視領导，与党对立。杜存訓虽經党的多年敎育，但他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本質根本沒有得到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杜存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惡面目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墮落成为工人阶級的叛徒，成为資产阶級在党內和工人阶級內部的

代理人。

杜存訓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一系列的反党罪惡活动，对党和工人群众的侵蝕，对工会工作的危害是極其严重的。經过全省四級幹部会議和省委全会的揭發和斗爭，杜存訓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百般狡賴，始終沒有向党和人民低头認罪。为了維护党的原則，純潔党的队伍，捍衛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全会一致决議，开除杜存訓的党籍，撤銷其党內一切职务，並建議有关方面撤銷其一切行政职务。

全会一致指出：徹底粉碎杜存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是河北党組織在两条道路斗爭中一場重大的胜利。全会号召各級党組織、全体党員和全体工会幹部，要从这一斗爭中吸取有益的教訓。

一、必須堅持党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絕对領导。从我党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工人运动始終是在党的領导下發展壯大和取得胜利的。我国工人阶級和全体人民的無数历史經驗証明，沒有党的領导就沒有社会主义事業的偉大胜利，就沒有工人阶級的徹底解放。資产阶級右派和工人阶級叛徒，为了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事業，反对和破坏工人运动，首先就是千方百計反对党的領导。因此，各級工会組織和全体工人阶級，要堅决維护党对工人运动的領导，維护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路綫，維护党和工人阶級的团結，防止敌人从外部和內部破坏工人阶級社会主义事業的一切企圖。

二、必須加强党对工会的政治思想領导和对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我們党从来就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人阶級。我們工人阶級在党領导之下，完全了解自己肩負着改造社会、征服自然、解放全人类的偉大历史使命。資产阶級右派常是散布狹隘的經济主义、資本主义思想，来腐蝕工人和工会組織，把工人阶級暫时的眼前的利益和長远利益对立起来，借以模糊工人阶級的阶級意識，使工人看不到自己肩負的偉大历史使命和远大前途，並最終

引导工人运动脱离社会主义方向，走向失败的道路。因此，工会組織必須坚持以从六亿人民出發，从社会主义总任务出發，經常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工人群众，使工人深刻認識自己阶級的目前利益和長远利益一致的关系，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一致的关系，提高阶級觉悟，坚决抵制各式各样資产阶級思想对工人阶級的侵蝕。

三、必須提高党內斗爭的原則性和警惕性。对于党內一切不利于党，不利于党的团結的言行，必須提高政治嗅觉，及时进行坚决的不調和的斗爭。必須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对于任何陽奉陰違，不服从党的領导和鬧無原則糾紛的現象，必須进行严肃的批判。所有幹部必須努力增强党性，提高共产主义覚悟，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善于識别一切反馬列主义的言行，抵制各式各样資产阶級思想影响，並与之坚决划清界限。

中国共产党貴州省委全体委員会議
——关于开除康健出党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一致通过）

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省委所召开的全省四級幹部会議上以及这次会議以后，省級机关宣傳、文教系統的党員幹部和貴陽师范学院的全体党員揭發了現任省委委員、貴陽师范学院院長康健所犯的严重错誤。根据揭發和查实的材料，康健所犯的错誤主要地表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重大的国际問題上，一貫坚持資产阶級民族主义的立場和修正主义的观点，对于苏联、对于匈牙利十月反革命暴乱事件、对于中苏关系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进行歪曲

和誹謗性的宣傳。在这种宣傳中，康健完全否定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和先进經驗，否定了苏联在保衛和發展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業和和平事業中所作的巨大貢献，歪曲了苏联共产党內的政治生活，誣蔑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和苏联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正义支援；他把匈牙利十月反革命暴乱事件說成是“匈牙利領导人教条主义地学習苏联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說“納吉是对的”，把中国人民学習苏联的先进經驗和成就說成是“迷信苏联”，把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作了庸俗的和挑撥性的宣傳、解釋。康健在有关国际問題上的宣傳，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結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結，而是有損于这些团結。康健的这种宣傳，严重地違反了党的紀律，並且已經在貴陽师范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二）在一九五七年的“大放大鳴”和反右派斗爭中，同情和支持右派的反动言論，鼓动右派集团向党进攻。在“大放大鳴”时，康健对于貴陽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張汝舟所写的“三化”論（旨在丑化党团員和积極分子）、朱厚錕等在省委宣傳工作会議和师范学院教师座談会上的發言（旨在攻击党的知識分子政策、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三反”、“肃反”等运动）、汪陞富所張貼的大字报（旨在誣蔑省委的主要負責同志），对于某些右派分子在文匯报上所提出的“党委应退出高等学校”、“教授治校”等謬論，都認为“很有道理”，大加讚揚。当貴陽师范学院的反右派斗爭即將开始、康健已經了解了关于开展反右派斗爭的精神以后，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納志良、刘智祥等在該院發起成立“爭取提高教师政治地位与物質待遇發啓委員会”，企圖制造当前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經济待遇“太低”和“遭到冷漠”的輿論，煽动全院的教师和学生、乃至全省和全国的学校教师起来鬧“大民主”，以遂行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对于这一右派集团的陰謀活动，康健不只同情他們的反动言論，而且积極地为

他們出計献策，支持和贊助他們的行动。在这一反动組織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后，康健都發表了表示同情和支持的談話。在六月三日該院的学生代表会上，右派分子納志良、曾先才等提出要为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物質待遇問題向社会上呼吁，康健当即热烈鼓掌，並且督促他們赶快通过"呼吁書"；当会議通过"呼吁書"时，康健高举双手，鼓掌拥护。在"呼吁書"被通过以后，康健以为書中的反动論据不足，指示右派分子搜集"具体的、有說服力的材料"，加以补充，交由省教育工会（康健为主席）"轉达上去"，並且指示学院办公室支持經費，要他們把"呼吁書""印几百份發出去"（实际上已向全国各地發出三百份），以扩大社会宣傳。在貴陽师范学院展开反右派斗爭以后，康健又多方面地为該院的某些右派分子开脫罪責，認为党員、积極分子"把紅旗插得太高了"；有的右派分子被群众批判，他就赶忙握手賠罪，竟說"这一个半月来你受惊了"。事实說明，在"大放大鳴"和反右派斗爭中，康健已經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員应有的立場，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康健对于"爭取提高教师政治地位与物質待遇發啓委員会"这个右派集团，他不仅是一个积極的支持者和宣傳者，而且是一个实际的参加者。康健的这种叛逆行为，使党在貴陽师范学院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損害。

（三）目無組織，抗拒領导，吹嘘个人，打击同志，把貴陽师范学院当作他个人所把持的"独立王国"。自从一九五二年康健到貴陽师范学院担任院長以来，他对于省委、省委宣傳部和文教部的領导，始終抱着抵抗的态度，用"頂回去"和"把住大門"的办法，使省委的某些重要的指示不能在貴陽师范学院得到貫徹。他对于省委所召开的各种会議，常常表示不願参加，認为参加省委的会議，就躭誤了他的教学工作和学習科学。他在省委文教部所召开的会議上，一貫地採取了傲慢和对抗的态度。在貴陽师范学院的党委会建立以后，即便是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之后，康健仍然坚持在学院工作的領导上执行"一長

制"，許多重大問題不經党委会的討論，即由个人决定、公布，以排斥党委会对于学院工作的統一領导和监督。在康健的心目中，党委会只是他个人的附屬物；他公然向其他高等学校的同志說："党委开会，你們同意我的意見了，这就是党委制；你們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就按老法子办，还是一長制。"在一切場合下，康健总是吹嘘自己，極力地在群众中制造个人崇拜。他竟然决定把他进入学院工作、对該院教师开始进行思想改造的六月十二日定为"院庆日"，以該院的开創者自居；甚至容許並且在群众中备加贊揚于一九五三年的"院庆日"在該院的壁报上所貼出的他同毛主席在一起的大幅画象和歌頌他的詩句。康健对于在貴陽师范学院工作的一些較老的党員幹部，一貫地採取了排斥和打击的态度，說他們"不懂裝懂"、"已經过时"、"要被淘汰"，不能建設社会主义和办高等学校，說他們在那里工作是給他"背包袱"、"戳窟窿"，对于他們进行諷刺、謾駡和打击，使他們难于工作，並且想把他們一个一个地赶出去。为了打击老幹部，他甚至採用了拉攏一批、打击一批的惡劣手段。对于省委的一些負責同志和省委文教部的負責同志，康健不断地散布一些流言蜚語；他甚至有意地在党內制造輿論，企圖搞垮省委文教部的負責同志。康健对待組織、对待同志的惡劣态度，是他的資产阶級極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反映。他的这些錯誤行为，严重地違反了党的組織原則，損害了党的团結。

（四）在实际工作中，一貫地歪曲党的方針、政策，表現为严重的右傾机会主义。在知識分子工作中，康健歪曲了团結、教育、改造的方針，片面地、孤立地强調了团結的一面，而忽視和放棄了教育、改造的一面。在康健看来，知識分子都已經改造好了，不用再改造了。他認为知識分子一向"吃不开"，現在該是"知識分子上台"、"工农幹部下台"的时候了。他認为知識分子"有学問"，再提改造，会伤害他們的自尊心。因此，康健对于知識分子总是百般迁就、無所不从，很少对于他們进行批評和

帮助。他在知識分子的建党工作和幹部工作中，总是只强調業务能力，不問政治品質。他給学生指引的方向，是脫离实际、脫离政治的方向；他办学校所走的道路，实际上就是"教授治校"的道路。在"肃反"工作中，特别是在这一工作的后期，康健完全成为一个投降主义者，說"肃反"完全錯了。康健对于党的各項方針、政策，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並且夸大实际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对于党的各項方針、政策加以歪曲。他总是从反面去看党的文件和报紙，不相信党的号召和指示。对于貴陽师范学院的"三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党的历次整風运动，他都加以歪曲，否定了这些运动的成就。在这里，充分地暴露了康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場。

根据上述事实，省委全会認为康健的錯誤是極端严重的：他已經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背叛了党的原則，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無产阶級的革命事業，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严肃党的紀律，省委全会决議：撤銷康健的省委委員和他在党內的其他职务，开除康健的党籍；並且建議有关方面撤銷康健的一切行政职务。

省委全会認为，康健在上述一切問題上所持的立場、观点和他的思想作風，都是資产阶級的阶級实質的反映。康健所以墮落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康健出身于惡霸地主家庭，亲自参加过地主剝削，而且長期受了資产阶級的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成为一个資产阶級型的知識分子。在抗日战争以前，当时康健为了維护自己的阶級利益，在政治上进行投机，曾經加入了国民党，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改組派。到了抗日战爭暴發和全民救亡运动兴起，他又抱着政治投机的思想，混入了共产党內。据康健自己交代，在他参加共产党的时候，他对于党是怀疑的，認为党不相信知識分子，是帶了"阶級異己情調"入党的。由此可見，康健在入党时，从自己的出身和历史上帶来了兩个特性：一

是資产阶級思想原封未动；一是在政治上进行投机。康健在入党以后，經历了二十年的革命斗爭。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康健不能不暴露他的阶級本性，不能不引起党組織同他的錯誤思想进行严重的斗爭。从历史上看，康健的最突出的問題，是他的損人利己、欺上压下的思想作風。为了同他的这种惡劣作風进行斗爭，在历次整風、整党运动中，党組織都曾以他为重点，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教育。但是，每当这种时候，康健却总是用假檢討和混过去的办法，拒絕接受党的教育。而康健的資产阶級的反动立場也是一向未变的，只是由于他有时把它用"左"的形式掩护起来，有时把它用馬列主义的詞句伪裝起来；主要的則是用他的投机取巧的兩面手段把它蒙混过去，以致在过去長时期內沒有暴露它的眞面目。一直到了中国革命走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現阶段，当国际、国內的牛鬼蛇神一起向革命大举进攻的时候，康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場和观点才充分地暴露出来。由此可見，康健是一个原封未动的資产阶級分子，是長期隐蔽在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和政治上的投机分子；貴州的党組織从党的領导机構中把他揭露出来，是貴州党在整風运动中的胜利。

省委全会認为全省的党員，特别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党員，都应当从康健所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一）康健是一个二十年的党員，由于他坚持他的資产阶級的反动立場，拒絕党的教育、改造，終于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右派分子。这說明一个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党員，要从思想上得到徹底的改造，从根本上轉变立場，必須經历長期的和严重的阶級斗爭。思想改造要靠党的教育和群众的教育，但是最起作用的还是自己的觉悟；党和群众的教育，只能通过一个人的自觉，才会發生作用。改造思想，必須採取老实态度，一点也不能作伪；誰要作伪，誰就欺騙了自己。康健入党二十年，党对他的教育不能說少，而由于他根本沒有这种觉悟，一貫作虛弄假，他的資产阶級的反动立場仍是原封未动，經不起阶

級斗爭的严重考驗。在我們党內，資产阶級的思想同無产阶級的思想，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要作一个眞正的共产党員，就必須淸除資产阶級的思想。在剝削制度基本上已經被消灭以后，形形色色的資产阶級思想，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大敌，而資产阶級思想在知識分子中的最突出的表現，則是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在我們党內，有不少同志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对于知識分子出身的党員来說，应当特別警惕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思想，否則也会走上康健所走的道路。

（二）我們同康健的錯誤所进行的斗爭，是在政治理論战綫上的兩条道路的斗爭，是保衛馬克思主义和反馬克思主义的斗爭。康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总是披了馬克思主义的外衣。現在看来，康健对于国际、国內的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所持的立場和观点，証明他一向就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但是長期以来，人們却为他的外衣所迷惑，一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我們經过了反右派斗爭，在政治上提高了警惕，才把他从他的外衣里揭露出来。这里說明，我們在政治战綫上同反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斗爭，必須同时在理論战綫上同一切修正主义者进行斗爭。我們要在政治、理論战綫上胜利地开展兩条道路的斗爭，就必須紧紧地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我們必須加紧理論学習，提高我們的理論水平，在理論战綫上去明辨敌我、是非和眞伪。任何修正主义的观点都是反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我們都必須同它們进行坚决的斗爭。

（三）从康健的錯誤中說明，一个未經改造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总是以極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同党的組織原則相对抗：以个人突出同党的集体領导相对抗，以分散主义同党的統一集中相对抗，以自由主义同党的紀律相对抗，甚至以宗派活动、分裂党的組織，同党的团結相对抗。个人同組織相对抗，要求組織服从个人，或者只要个人、不要組織，这是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的本能的表現，其目的在于从組織上制造混乱，削弱組織的作用，以实

現个人的野心。党的集体領导的原則，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个人服从組織、下級服从上級、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則，都是从組織上維护党的統一和团結的重大原則；沒有这些重大的組織原則，党就不能有統一和团結，就無所謂党組織，党就失去了一切，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战斗力。正因如此，党的敌人总是千方百計地陰謀从我們党的組織上破坏我們党的事業，而党內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思想，正是可供敌人利用的基础，这就是說：維护党的組織原則，就是維护党的生命；我們必須同那些違反党的組織原則、違反党的紀律的分子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斗爭。

省委全会認为，康健的問題对于全党都有教育意义，决議在全体党員中进行傳达。康健的錯誤思想在高等学校中已經产生了影响，省委全会要求各高等学校的党組織在党內、党外採取措施，徹底地淸除这种錯誤思想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貴州省委員会第五次全体会議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梁旺貴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一致通过）

省委候补委員、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書記处書記、副州長梁旺貴（侗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早在去年七、八月間黔东南州級机关开展反右派斗爭和省民族代表座談会斗爭右派分子王天錫时已有揭露，在去年十一月間全省四級幹部会議上，黔东南代表团对他的罪行又进行了大量地揭發和系統地批判。經过黔东南州委的詳細查对和这次省委全会的充分討論，已可肯定梁旺貴是隐藏在党內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

揭發的材料說明，梁旺貴已經和馮兴謨（侗族，黔东南自治

州州委委員、州人民委員会秘書長）結成了反党同盟。他們以資产阶級民族主义作武器，进行破坏党的团結和民族团結的活动。他們对待苗族党員幹部，採取了打击和排斥的态度。他們对待一些担負領导工作的苗族党員幹部，經常散布流言蜚語，进行惡意的誹謗。並且，他們在一些侗族党員幹部中，进行挑撥活动，离間各民族党員幹部之間的关系。

揭發的材料說明，梁旺貴、馮兴謨已經和王天錫右派集团結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盟。这兩个右派集团的共同罪行，是以建立侗族自治州为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裂民族团結的陰謀活动。在这一陰謀活动中，梁旺貴是主要策动者之一。早在一九五四年梁旺貴就背着党同王天錫勾結在一起。梁旺貴和他的反党伙伴馮兴謨，同王天錫的关系十分密切，無所不談，对党却不講实話。去年一月，王天錫进行签名活动时，曾派人通过馮兴謨和梁旺貴联系，王天錫右派集团草拟的所謂申請建州的文件，也是經过馮兴謨看过的。这些事实已經充分暴露了梁旺貴的政治面貌。他已經完全墮落成为一个披着民族外衣的右派分子了。

揭發的材料說明，去年五月王天錫右派集团中的張克剛、歐陽淇，在黔东南自治州政协会上肆意向党进攻的时候，梁旺貴不仅暗中参与、公开鼓励和支持，还利用自己的职权，从另一方面向党展开进攻。他积極布置調查材料，派人到农村进行煽动，亲自活动新华社記者向中央反映所謂"群众"建州要求，企圖"以群众性来压迫中央"，其反党活动真是猖狂已極。

揭發的材料說明，去年7月，梁旺貴曾再三阻止对歐陽淇等右派分子的斗爭。去年十一月，全省四級幹部会議上，开始揭發他的罪行时，他曾威胁馮兴謨，阻止暴露他的反党活动。直到他的反党罪行全部被揭發出来，才不得不低头認罪。

另外，揭發的材料还說明，梁旺貴对于本民族富裕农民鬧粮积極地支持，对民族上層人士撤消乡支部書記职务、开除农業社社員的反动行为，不聞不問，失掉了一个共产党員应有的立場。

梁旺貴成为資产阶級右派並不是偶然的。他有極端严重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野心。他有濃厚的狹隘的民族优越感，看不起苗族，甚至連自治州名称把苗族排在前面也表示不滿。他以資产阶級民族主义的观点看待党。不把党看成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統一的党，而看成是各民族的联合会，对某些党組織沒有本民族領导幹部就極端不滿，以致發展到誹謗省委执行民族政策不公平，發表所謂"对苗族轟轟烈烈，对侗族冷冷淡淡"的謬論，否定党在侗族地区执行民族政策的巨大成績。在建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后，不顧历史發展的現实条件，不顧是否对社会主义有利、对巩固各民族的团結有利，坚持單幹，破坏联合。他还利用某些侗族党員幹部的狹隘的民族感情，經常散布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毒素，进行挑撥活动，企圖拉攏这些同志失足落水。以致發展到勾結党外右派集团，互相策应，共同进行分裂民族团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活动。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实現他的个人野心，即为了建立以他为首的資产阶級的"独立王国"。極端严重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野心，就是梁旺貴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右派的思想根源。

打着民族旗幟，进行分裂民族团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活动，是一切民族中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其实他們並不是民族的眞正代表者，他們实际上是代表那些已經被消灭或正在被消灭的剝削阶級，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胜利的形势下进行的掙扎和反抗。梁旺貴出身于上層小資产阶級的小知識分子，因为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所以在这一場尖銳的斗爭中墮落成为右派。这就是梁旺貴墮落成为右派的阶級根源和历史环境。

全会高兴地指出，黔东南自治州的党組織是团結的，黔东南自治州各民族的幹部也是团結的，所以梁旺貴的反党陰謀並未得逞。但是梁旺貴的反党活动已經給黔东南自治州的党組織帶来了一定程度的危害。为此，对梁旺貴的罪行必須进行充分揭發和批判。这对于加强黔东南自治州党組織的团結和民族团結是十分重

要的。

全会一致指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导下，我省几年来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成績是很大的，侗族地区並不例外。梁旺貴誹謗党执行民族政策不公平，否定民族工作成績，是毫無根据的。至于說对“侗族冷冷淡淡”，这是和右派分子王天錫的“大汉族主义使侗族四分五裂”的謬論一脈相通的。同时一致指出，我省历史發展狀況的特点是各民族杂居，所以有大量的农業生产合作社是民族联合社，有許多机关、工厂、学校都是各民族工人、学生、教师、幹部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各自治州、自治县也都是各民族杂居的。因此，强調各民族之間团結互助，对于我省社会主义建設有特別重大的意义。那种不願联合只願單幹的民族分裂主义傾向是極端有害的。

为了巩固党的团結，純潔党的組織，加强民族团結，全会决定：开除梁旺貴的党籍，撤銷其省委候补委員、州委書記处書記，一切党內职务。並在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区的党組織內进行傳达，接受經驗教訓，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爭。

全党应当从对梁旺貴的斗爭中吸取什么教訓呢？

一、維护民族团結，把各民族团結在祖国的大家庭之內，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業而共同奋斗，这是各民族的基本任务。而民族中的資产阶級右派，总是披着民族外衣，以維护本民族利益面貌出现，进行分裂民族团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因此，必須提高警惕，注意資产阶級右派进行分裂民族团結的陰謀活动，一經發觉，就应当毫不容情地加以揭發和斗爭。

二、民族中的資产阶級右派在进行分裂民族团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活动时，总是以地方民族主义作为武器的。事实証明，地方民族主义有了新的滋長，並且已經成为一种危險傾向。因此，必須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爭。首先要在下例几个問題上，与地方民族主义划清界限。1、不能把民族区域自治和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对立起来，应当把民族自治区域作为社会主义

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自治的目的，从根本上說来，是为了团結各民族来共同建設社会主义的祖国。披着民族外衣的右派——地方民族主义者，为自治而自治，实际上是要建立"独立王国"，借口"当家作主"，不要党的領导。2、不能片面强調照顧民族特点。不管这些特点对社会主义事業是否有利，对各民族的团結是否有利，对于本民族的發展是否有利，一律都要强調照顧，是沒有好处的。其实民族特点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好的發揚，不好的抛棄，这对于各民族的發展只有好处。社会主义的胜利，必然將各民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民族。同时，各民族之間，也在互相学習，取長补短，誰的長处学得多，誰的进步就快。把民族特点看成鉄板一塊，而片面强調照顧，就阻碍了民族的进步。地方民族主义者，正是利用这一民族偏見，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当然，各民族特点的应兴应革，是各民族自己的事情，絕不可强加于人。3、在民族关系上，不願联合，只願單幹，是錯誤的。这是違反历史發展規律的。右派正是利用这一种錯誤心理来破坏民族团結的活动的。必須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主义立場和社会主义立場的斗爭，实际上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兩条道路的斗爭，地方民族主义者实質上就是資产阶級右派的一部分。我們各民族幹部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各个民族成份的党員和幹部都应該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应該被民族主义的毒菌所沾污。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不徹底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迟早就会走上梁旺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个人主义思想与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常常糾纏在一起。作为一个共产党員和幹部，不論是那一个民族成份，都必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力求共产主义化，把自己鍛煉成为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不能只指望以一个民族身份向党要特殊待遇。我省各民族成份的党員，一般党龄都比較短，共产主义教育还很不够，更必須虚心学習，与汉族党員幹部一样，訂出計

划，認眞改造自己。

四、加强組織性和紀律性，反对任何破坏党的团結統一的活动。对于違犯党紀国法的党員，不論那一个民族成份，都必須按党章国法处理，不能有任何迁就。否則，对党和党員都是沒有好处的。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一屆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关于开除叛党分子刘建的党籍的决定

（1957年12月19日全体通过）

前中共山东省委委員、大众日报总編輯刘建，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后，即散布他的資产阶級办报綱領，至大鳴大放期間，完全走上了背叛党的道路，变成一个徹头徹尾的党內極右分子，並抗拒改造，叛党自杀。他的主要反党罪行如下：

一、刘建企圖用資产阶級的办报綱領，篡改大众日报的政治方向和党报性質。他經常以自己的所謂"群众性"反对报紙的党性，他所指的群众实际上是資产阶級的知識分子、小資产阶級、小市民等。他主張报紙不登或少登省委和省人委的指示以及党的生活的宣傳报道，把上級机关的指示看成是不代表"群众"利益的。他主張庸俗的兴趣第一，經常强調所謂"兴趣性"，以圖取消报紙的阶級性和报紙对工作的指导作用，想用办所謂"群众"报对抗党委的机关报。他对揭露我們新社会的"黑暗面"兴趣極濃，要党报工作人員全面地揭露社会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並以此作为"思想活潑"的标准。同时煽动編輯部人員要說中央、

省委沒有說过的話，他認为說中央、省委說过的話，就是教条主义。他借口报紙是群众的"喉舌"是"輿論机关"，要适应讀者的"兴趣"和"爱好"，如不改变党报性質，就会引起各方面的矛盾等，公然提出：要省委擺脫与报紙的关系，要"从根本上改造报紙"，"实行报紙革命"，要求省委另办一張供幹部看的报紙，而把大众日报变成"群众"报，也就是完全脫离党的領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刊物。

二、为了实現他的反动的办报綱領，在組織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有一套完整的"組織路綫"。如主張聘請"老报人"（即在国民党和敌伪时期办过报的人）当报紙"顧問"，由他們来修改重要文章和处理标題。为了"改革"报紙，在刘建直接指示与主持下在报社內部所組成的"报改小組"有半数是右派分子，"报改小組"的成員用了很長时間，大量地搜集和閱讀了資本主义国家的新聞書籍，进行制訂报改方案。他反对党的德、才兼备的幹部政策，主張"文人办报"，对某些未經很好改造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未被提拔到領导崗位上来表示不滿，他認为这就是"宗派主义"。对某些老幹部在文字水平上的缺陷，則極力加以夸大，企圖將他們排挤出去。积極倡导資产阶級"报人"的領导方法和办报方法。甚至認为当省委委員同时办报不方便，必須解除他的总編輯以外的一切职务（主要是擺脫省委委員）才能把报紙办好。

三、刘建从他的資产阶級的办报观点和立場出發，極力反对党对报紙的領导，經常抵抗、攻击、誣蔑省委，並同党委对立。自去年冬季以来，屢次抗拒登載省委和省人委的指示、报告等。如：省委关于农村工作的补充指示，他表示不同意登載；去年冬季进行基層选举时，省委指示大众日报要随同轉載人民日报有关社論和国务院的通知，以及省人委負責同志关于"保証做好基層选举工作"的报告，他兩次打电話加以拒絕；省委傳达二中全会的决議的会議，他認为沒有"新"內容，不准备登报，經省委指

責后他才勉强用了新华社稿。今年二月省委負責同志在全省县委書記会議上严厉批評了大众日报“强调群众性，忽视党性”的錯誤，刘建却在背后誹謗省委，煽动报社同志对省委的不满。在大鳴大放期間，他更加狂妄地說：省委錯了，他对了；省委是外行，他是內行。利用各种場合放火，向省委进攻。

与此同时，他对新聞界中的右派分子王中却佩服得五体投地，並避开省委讓王中給报社全体工作人員作报告，随后又組織專門的座談討論。对于王中在报社散布“报紙不能指导工作”、“兴趣性”、“机关报受約束”等反动論点及辱罵党报是“寡妇臉”、“鉄青面孔”、“板着面孔教訓人”等反动言論則極力加以宣揚。刘建与王中密談时，散布了許多流言蜚語，誣蔑省委。

以上事实完全証明了：刘建是有严重的反党罪行的極右分子，正如他在“絕命書”中自己承認的：“我是山东党內最大的極右分子”、“我的反党罪行到了無以复加的程度，竟至反起党中央来了”。省委發觉刘建錯誤后，曾数次找他談話，耐心地对其进行教育，讓他主动檢討和交代，但刘建沒有这样作，而在其“絕命書”中說：党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教育，然而他由于存有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自知罪孽深重，不願徹底檢討交代，拒絕党的教育，拒絕改造自己，最后採用了可耻的自杀手段，完全走上了叛党的道路。因此，經省委十一月十二日会議決定和省第一屆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通过开除叛党分子刘建的党籍，並撤銷其党內外一切职务。

中国共产党监察部党组关于右派分子王翰的处理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王翰，原名陈延庆，男，四十六岁，江苏省鹽城县梁垛乡人（现划归建湖县），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春由于上海南市的組織破坏，动搖脫党回家，一九三四年春在上海复旦大学恢复关系。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秘書長，中共鄂西北区党委書記，新四軍第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城工部組長，中南人民监察委員会副主任、主任，前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員会副主任、党組副書記，监察部副部長（七級）、党組副書記，中共中央监察委員会候补委員，“八大”代表。

王翰是监察部右派反党集团首領，極右分子，他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如下：

一、經常散布反党反馬列主义的謬論，散布取消阶級斗爭的观点。他說三大改造以后，过渡时期就結束了。意思就是阶級斗爭就息灭了。他詆毁党所領导的历次政治运动，說“每次运动开始都是反右，以后反左，最后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他指責土改时对地主斗爭过火，主張溫和一些。他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說，以反对唯成份論为借口，在發展党員时，要吸收所謂有文化有才能的知識分子，並把一些政治历史未考查清楚的人吸收到党內来。他反对党內思想斗爭，誣蔑列宁对托洛茨基等叛徒只講团結，沒有斗爭，誣蔑刘少奇同志的“論党內斗爭”是“論党內妥协”。他造謠說“馬克思規定的一些原則是为了給別人遵守

的，馬克思自己並不遵守”，“馬克思只会写文章，不懂得什么科学”。他还誣蔑“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沒有什么新的东西”，並散布毛主席这一报告中有“修正主义”。

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宣傳社会主义制度有陰暗面的荒謬观点。他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成績，說“国务院所屬各部門的工作是一塌糊塗，經不起檢查”；攻击我国發展国民經济計划不是“冒进”就是“冒退”；認为現在的大学教育和建筑工程都不如解放以前；对黃紹竑的反社会主义言論十分贊賞，到处替黃紹竑吹噓。他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經常在幹部中宣揚資本主义的厂矿企業經营管理完善和产品优美，美国的托拉斯形式好，他認为苏联改变工業体制，是学習美国的托拉斯形式。他坚持要用美国資产阶級学者杜威的“圖書十进分类法”来整理监察机关的档案，反对国家档案局关于整理国家机关档案的規定。

三、王翰在监察工作的重大問題上，反对中央和监察部党組的指示和决議，企圖貫徹他的反党主張。他認为监察机关与其他業务部門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他坚持监察机关的任务应該是經常地、系統地、前后啣接地檢查生产、經济、財务活动，不仅要全面地檢查国家計划、財务預算的执行和总結，而且要檢查国家計划、財务預算的制定。說只有这样作，才能抓住“有头等意义的大問題，打中要害”。主張“要多搞些头头”，才能解决“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問題，企圖把矛头指向各級党政領导机关。他反对监察机关檢查案件及处理公民控訴工作，說这些工作是“鷄毛蒜皮，意义不大”。甚至主張对严重違法乱紀分子要“爱人以德”。在监察工作的作法上，他坚决主張“事先监督”，反对中央关于事后檢查的指示；坚持监察机关要保留对財經部門行使停止支付权力；反对监察机关依靠各級党政領导进行工作；誣蔑党的群众路綫是“抽象的”，监察机关走群众路綫不解决問題。在

体制問題上，他坚持要搞垂直領导，坚持要有管理各級监察幹部的权限；反对中央关于监察部門体制改为双重領导的决定。王翰还一貫以学習業务为幌子，反对加强监察机关的政治思想領导，反对监察幹部訓練班教政治課，說什么"業务就是政治，沒有業务那有政治"。

四、王翰为了实現他的一套反党主張，在监察部工作中和右派分子彭达、陈达之等勾結起来，形成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他在工作中採取陽奉陰違的兩面手法，对中央和党組的指示和决議，当面同意，背后反对，經常和党組鬧对立，並多次乘党組多数成員不在时，擅自改变党組决定。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議前后，王翰竟策动他的反党集团分子彭达等大肆活动，反对中央关于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領导的决定和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議的决議。这一陰謀未能得逞，他們就在部內外散布流言蜚語，誣蔑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議沒有解决問題。

王翰还和他的反党集团分子互相吹捧，經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破坏党組威信。他們誣蔑党組成員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不懂業务"，"沒有常識"，揚言"党組成員中唯有王翰熟悉業务，监察部离开王翰不行"，暗示王翰应該当监察部長，甚至吹嘘王翰应該选为中央委員。

王翰还在幹部中拉攏一些人，打击一些人，培植亲信，封官許願，企圖扩大他的反党集团，並企圖以整調机構和領导分工来控制监察部的全盘工作。

五、在日常工作中，王翰一貫目無組織，独断專行。他决定的許多重大問題，既不向党組請示报告，也不傾听下面的意見。当他的反党主張受到抵制或别人的意見不合他的心意时，他就利用各种机会，發牢騷，散布不滿情緒，或者刁难打击、辱罵訓斥幹部。甚至故意制造混乱，撥弄是非，他常常在公文上胡写乱划，挖苦諷刺，写些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批語。或者答非所問、張冠李戴。他經常用詭辯的方法来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为

他的反党活动进行辯护。如他为了坚持“事先监督”，就說“事先就是事后，事先事后沒有絕对区别”。为了坚持实行垂直領导，就說“双重、垂直各有利弊，双重好，还是垂直好，很难說”。他还散布“越抽象就越具体，越具体就越抽象”、“什么都不管，也就什么都管了”、“不解决問題，問題也就解决了”等謬論，以此在幹部中制造混乱。

王翰腐朽的資产阶級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上。他在生活上極力地追求享受，严重地舖張浪費。

六、整風开始，王翰积極煽風点火，篡改党組的整風計划，大肆向党进攻，企圖利用整風，搞垮党組，夺取监察部的領导权，以便实現他的一套反党主張。反右派斗爭开始，王翰抱着抗拒态度，邓小平同志傳达中央的报告他不去听，部里召开的各种反右派斗爭会議也極少参加，並积極为党內几个右派分子辯护。当二司批判彭达的反社会主义言論时，王翰千方百計地加以包庇。当部整風領导小組确定彭达为右派分子后，王翰立即向彭达通風报信，並訂立攻守同盟。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党組扩大会議討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布置本部反右派斗爭的部署时，王翰竟憤然离开会場，公开宣布以后不参加党組会議，当晚又給党組写信，进行威胁。

七、王翰反党反領导是由来已久的。他在上海作地下党工作时，即曾反对过区委的領导同志。一九三九年他在担任鄂西北区党委書記期間，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鄂西北准备游击战爭，支援鄂中游击战爭的指示；又違反党的秘密工作原則，进行党員登記，並把在李宗仁軍队工作的許多党員高級幹部也进行登記，后来把这些党員登記表連同中央的絕密文件一起失落到国民党特务手中，事后不按照領导同志的指示和同志的建議組織幹部撤退，結果使鄂西北党的組織遭到严重破坏，造成重大損失。他在新四軍第五师政治部任副主任时，一直主張和强調軍队政治工作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不服从鄂豫区党委的領导，並千

方百計的打击工农老幹部，进行反党反領导的宗派活动。他在中央城工部工作期間，也对領导不滿，背地进行誹謗，並誣蔑組織"不把人当人"。一九五一年王翰調到中南监察委員会工作以后，强調国家监察工作的独立性，公开反对前政务院关于各級监委应受同級政法委員会指导的指示，不出席中南政法委員会党組会議。他認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工作檢查不得，尽是毛病，与他們無法共事，誣蔑李先念同志"無能"，任中南行政委員会副主席不称职，並造謠說中央对李先念同志不信任，才叫李雪峰同志兼任一个副主席。他还把中南行政委員会和中南监委的領导和被領导关系当成是"要人、要錢、要編制的关系"。

王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其阶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王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長期受到資产阶級的教育。他虽然早就参加了党，但始終对党不忠誠。入党不久，又一度动搖脫党。他一貫追求个人权位，狂妄自大，不服从党的領导，拒絕党的教育和同志們的批評，拒絕进行自我改造。这些情况說明，王翰是一个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他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

几个月以来，王翰对自己的反党罪行不老实檢討交代，曾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經过多次大小会議斗爭以后，才表示低头認罪，写了九份"檢討"和"交代"，但对他的許多严重罪行，仍避重就輕，进行狡辯，企圖蒙混过关。

根据王翰的上述罪行和斗爭中的表現，决定开除其党籍，行政上撤銷其一切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原有待遇。

中国共产党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党組关于右派分子謝雪紅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

一、簡历

謝雪紅，女，57岁（一九〇一年生），汉族，台灣省彰化人。家庭出身搬运工人。本人成份是商人。

一九四七年七月，在香港重新入党。

謝雪紅家庭貧苦，幼时被卖为童养媳，長大后嫁与地主兼包工头張树敏为妾，随張到大陆来，在杭州参加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八月，由黄中美（后叛变，任蔣經国秘書）介紹入党。同年十月，党派她到苏联学習，在东方大学日本班学習兩年。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成立台灣共产党，即日本共产党台灣民族支部。謝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員。不久，謝在上海被捕，解往台灣，关了几个月，出獄后經营国际書店，她屡次抗拒共产国际东方局关于台共犯了右傾机会主义路綫錯誤的批評，在組織上鬧宗派主义，排除異己，直到剩下几个亲信。一九三一年六月再度被捕，起初表現尚好，但后公开声明"轉向"（即自首变节）反对共产国际的綱領，主張在日本天皇制度下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号召日本中国朝鮮台灣無产阶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美国。据楊春松同志揭發，謝还在獄中出卖同志：指証楊春松同志为台共党員。謝一直隐瞞这段历史（这个問題尚無旁証）。

謝被判徒刑十三年，但刑期未滿，一九三九年四月便以"停止执行"名义被釋放出来。出獄后，謝与日本特务高倉喜滿造往

来密切，同时与楊克煌在台中合股經营洋貨店"三美堂"。在日本进行侵略中国战爭期間，"三美堂"为日兵服务特别亲切，被称为"兵之家"。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謝在台中經营大华酒家，参加組織"人民协会"，进行政治活动。一九四六年一月，由陈立夫、李翼中（国民党台灣省党部主任）介紹参加国民党为特别党員，曾任国民党台灣省妇女运动委員会委員，台灣妇女会理事等职。

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起义中，謝在台中参加起义，当人民要求槍斃有血債的伪台中县長刘存忠时，謝千方百計加以包庇（最近刘存忠向大陆广播，感謝謝雪紅救命之恩）。在敌人反攻台中以前，謝携走公款台幣十万元，与楊克煌逃往埔里。敌人进攻埔里，人民武裝部队主动出击，回来时又找不到謝雪紅。謝与楊又逃跑了，逃到竹山，便写信給蔣經国（当时报載蔣經国要去鎮压二二八事件），說她是蔣經国的同学，是国民党員；說二二八起义是反对陈仪，不是反对国民党；要求蔣經国"寬大处理"。在政治上背棄人民起义，向蔣經国求饒。

一九四七年五月离开台灣。同年十一月，在党領导下，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謝任主席。一九四九年謝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任政协全国委員，全国妇联执委，民主青联副主席，华东軍政委員会委員等职。在党內，謝任华东局台灣工作委員会第二副書記，一九五一年八月因犯有严重錯誤被停止职务，参加整風、整党。

一九五五年二月，台盟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謝亦来京。在处理右派以前，謝任台盟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法案委員会委員，全国紅十字会理事；在党內，是中共台盟党組成員之一。

二、主要反动言行

（一）在台灣問題上，有一套反动的理論和政治綱領。

謝雪紅主張台灣"自治"，"高度自治"，"台人治台"。这种主張，实际上是要台灣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她和楊克煌都說：在日本統治时期，台灣人是一个"独立民族"。事实上，台灣人除少数高山族以外，都是汉族人民，絕不是一个独立民族。謝又强調台灣的政治經济文化和大陆有不同的特征，台灣人与大陆人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特殊的政治要求。根据上述理論，即独立民族和台灣特殊的理論，她坚持要求台灣"自治"，說"自治是台灣人民几十年来的要求，反对自治就是台灣人民和台灣历史的罪人"（斗爭会上說的）。

她的所謂"自治"是要求"省、县、市長，都要选举台灣人"（在党組会上說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台盟华北总支部成立会上，謝叫人代讀一个文件，說台盟还要掌握"武器斗爭"，台灣要在北京設立一个机構，"与各国通商"。她还組織了一个文化企業公司，在筹备会上，她答应这个公司將来可以回台灣接收文化企業。显然的，她的所謂"自治"实际上就是台灣独立。

謝为自己辯护，說她講自治是講历史，不是政治主張。事实不是如此。一九五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紀念中国政府在台灣受降十周年的指示中提到，在宣傳上应反对所謂"自治"。当李純青同志向她傳达时，她即表示反对。她还說"如果今天反对自治，在大陆上的台灣人也会覚得奇怪"，她在紀念会上竟避而不提反对自治。一九四七年五月，她在沈陽还向盟員黄启章等人宣傳自治主張。在斗爭会上，她还說不能打击現在在台灣的人要求自治，这种打击"是残酷的"。她並且悍然宣布：台灣民主自治台盟名称不能改，"自治"兩字不能取消。

台灣人不是少数民族，姑不論主張自治是否即主張独立，主張台灣自治就是違背宪法第三条及第四节第五节各条的規定。

（二）陰謀以台盟对抗党和代替党，反对党对台盟的領导和管台灣的事。

謝說"台盟是台灣各阶層人民統一战綫的核心"。在台盟华北总支部成立会上的文件中說，台盟在北京应負起下面的任务："向中央政府提供資料，作建議、要求，应其諮問，作各种交涉等，以及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联系，进一步与各国政府的通商等"。即在理論上，台盟在台灣要代替共产党的地位，为台灣各阶層人民的核心；其具体任务是"代表台民利益"，作为向中央政府的"交涉"团体，並且要"与各国通商"。

在党組会上，謝說："台灣人对共产党沒有好感，对台盟有好感"。又說："美国在台灣的主要敌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台盟"。

（三）依靠反革命分子、汉奸、不法資本家及各种坏分子，作为台盟的領导骨幹，並蒙蔽拉攏中間分子。

謝雪紅在总部过去依靠反革命分子李上根、王思翔，这兩人大权在握，掌握台盟公章，看絕密文件，事無大小皆与共謀。在北京，依靠汉奸楊克培、郭良，不法資本家林鏗生。林鏗生因严重違法被捕，出獄后，謝就支持並帮助他翻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謝竟私派林鏗生代表台盟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議。林非盟員亦非台盟机关幹部，謝說，"我是主席"，"我也是党"，我要派誰就派誰。在上海，謝依靠反革命分子林政汉。一九五一年謝曾支持林政汉陷害在林工厂內的七名工人为反革命分子。林政汉被捕后，謝一直为他呼寃，一九五六年夏天还向最高檢察院提出此案。在广州，謝依靠右派分子黃光衛，还为不法資本家丘晨波进行翻案。一九五六年五月和年底，謝兩度到广州視察，都向省委統战部提出丘案，認为处理不当，应予糾正。

一九五六年党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針以后，謝認为时机已到，便利用視察机会到上海、南京、武汉、福建、广州等地找她的亲信积極活动，未經台盟总部討論即向当地統战部提出了一批主委、副主委名單，企圖一手包办台盟各地人事安排，扩大她的个人势力。

謝对中間分子和不明眞象的人不惜用各种手段进行蒙蔽拉攏，她到处封官許願，送錢送礼並經常津貼一些人，用同乡感情，用干兒干女，台盟主席繼承人，甚至用包办入党入团作为培养个人势力的手段。

（四）对我党过渡时期的許多基本政策採取敌对态度。

在肃反問題上。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政协視察工作座談会上，謝提出一批案件，为反革命分子陈昌岱等人呼冤。她同情胡風反革命集团，对人說："胡風这些文人能搞什么，不过对現狀不滿發發牢騷而已。"謝为胡風分子王思翔說話，"王和革命有血肉关系，是被人陷害。"甚至为王思翔哭泣和失眠。一九五一年鎮反时，謝雪紅和楊克煌写信給台盟华北总支部，阻撓在台盟机关幹部中进行鎮反运动。

丧失民族立場，包庇汉奸。一九五〇年六月，謝向政协全国委員会提出一个建議案，污蔑偉大的抗日战爭为"中日兩国处于交战狀态"，"此种敌对行为应由日本国家及發动战爭之国家（指中国）主要官吏負責"，"敌国人民（指台灣人民）不負战爭責任"，台灣沒有汉奸，因此她建議："請政府明令宣布保障台灣人民生命財产"。与此同时，她为文化汉奸柯政和請求發还被沒收的財产；在上海，为台灣买办資本家林勳奔走几个月，企圖从国家手中取回已被接管的大批房产。

对三反五反一直不滿，一直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依法处理的不法資本家林鏗生、丘晨波等人进行翻案。

在思想改造問題上，她曾阻撓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文化汉奸江文也在报上發表檢討文章，並攻击音院党組織說："党委为什么不能对你負責，讓你發表文章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謝曾替惡霸地主呼冤。江宏俊之父为惡霸地主，在土改中被斗自杀，江宏俊写了"訴狀"，謝替他轉給华东土改委員会，支持江控告农民。

（五）反抗党的領导，破坏党的团結，誣告党員同志为反革

命分子。

一九五〇年四月，謝支持反动分子企圖推翻上海台灣同乡会的党的領导权，公然进行反党活动。华东局組織部長刘曉不同意她对同乡会問題的意見，她在背后威胁說："要自杀給刘曉看。"一九五一年，謝沒有当上全国妇联执行委員，就在支部大会上大罵华东妇联党組，並通过楊克煌二次向中央控告。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謝沒有当上全国政协委員，她在台盟党組会上攻击中央統战部安排台盟政协委員"都是台灣人民有仇恨的人"。在党的会議上，称我党为"領导党"。

一九五六年，謝向中央要求拜見当时来京的日共志賀义雄，說要向志賀彙报台共情況。中央不同意。謝竟將此事告訴非党群众右派分子沈毅，表示不滿。

謝在台盟总部叫群众非法监視台盟中的党員李純青、陈炳基、馬再光等人的行动，收买东單区公安局坏分子楊錫琨（最近已逮捕）調查党員行动，搜集控告材料，並造謠說"陈炳基要杀謝雪紅"。

謝經常將党內文件給沈毅看，曾經將第九兵团准备在台灣登陆的絕密材料及敌情材料給反革命分子李上根看。通过楊錫琨，叫沈毅写报告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会，控告党員陈炳基等人。謝在沈的控告中加註：1.此事不要給李純青知道。2.控告書不要轉交統战部。

据沈毅揭露，謝叫她抄写材料誣告党員和非党人士十八名。党員李純青、陈炳基、徐萌山、王錫珍、王天强、謝雪堂、吳克泰、李乔松、林良材等均被誣告为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嫌疑。中央公安部为对外机关，謝向中央公安部告反革命案三十余件，其中被誣告的有許多是党員同志。

（六）大鳴大放期間，用各种方式点火，向党进攻。

謝在幕后主使台盟幹部沈毅攻击党的幹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只照顧党員"；丑化在台盟工作的党員，攻击台盟工作

是“党員包而不办，几年来沒有什么成績”。攻击統战政策是“統进步不統落后”，“宁左勿右”，誣蔑中央統战部“偏听偏信”。在沈毅放火以后，謝对沈說“中央統战部有兩个意見，叫沈去中央統战部替她‘摸底’。”

謝还煽动幹部用写大字报，向报社投稿等办法，企圖赶走台盟的共产党員。

謝挑撥高山族和党的关系，对賈藤武說：你們多来几个人，参加台盟整風，好好地整他們（指台盟党員）。“他們不关心高山族，只有我是关心高山族”。

謝通过沈毅向盟員右派分子江文也点火。江在台盟北京市支部鳴放会上說：“共产党歧視台灣人”。“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台灣解放后，不要再来个二·二八事变”。又說：“东京有个廖文毅，台灣有个蔣介石，大陆有个謝主席，这是国际問題，統战部为什么不重視謝主席？”

謝向盟員右派分子王象（由济南来京）点火，王在台盟北京市支部大肆汚蔑三反运动，反对台盟整理組織，要求重用謝雪紅的亲信右派分子楊克煌，並且攻击党說：“中央統战部搗乱台盟，要搞垮台盟”。会后，謝对台盟幹部林建文称讚王象的發言說：“王象說的都是事实，是心里話，这話不听听什么話”。

謝还向天津盟員張午亭点火，叫張到中共天津市委統战部責問：“为什么天津台盟要改为小組，为什么不能作市級机構活动？”还为張壯胆說：“你就說是謝主席叫我来問的，不要紧，有事我負責”。而天津台盟改組的事，謝是知道的。改組前，天津台盟盟員成份很复杂，連老牌国际間諜日本人谷立正也被吸收为盟員。

謝到广州向右派分子刘剛点火，說：“胆子大一些，你的任务重大”。她叫刘向党进攻，刘在鳴放期間就猖狂地向党进攻。

（七）积極阻撓和破坏反右派斗爭。

一九五七年七月，在全国人代会开会期間，暗示陈汝棠代

表不要揭發章伯鈞，說："不要落井下石，不要指名批判，放放空砲好了。"

当台盟开始反右派斗爭时，謝制造空气說："台盟沒有右派。整風是要搞高級知識分子。"

当台盟斗爭右派分子江文也时，謝叫沈把会議情况記录下来，向她彙报。江文也揭露了沈毅点火活动，群众要沈交代私房話，謝惡毒地教沈說："你可以問什么叫私房說，你是沒有丈夫的人，为什么侮辱你？"又說："反正撕破臉皮了，你就說是陈炳基叫你去点火好了"。

当台盟斗爭右派分子沈毅时，謝教沈要象踩不死的野花一样頑抗到底，还向沈送錢送礼，秘密对沈指示机宜。

（八）狂妄的个人野心。

謝的心腹楊克煌、王思翔等人写过几本書和許多文章，把謝雪紅描繪为一个偉大的人物，吹噓她是"老革命"，二二八"女英雄"。而謝則把这些書到处分送。在斗爭会上，她說推銷楊克煌的書是党給她的任务。文字宣傳嫌不够，謝还要江文也等人为她的"英雄傳記"写歌剧和話剧。国內宣傳嫌不够，在香港时，她把自己的自傳和照片分寄美英日及东南亞各国，广向資本主义国家作自我宣傳。謝叫盟員甘瑩写文章，称她为"台灣人的媽媽"。在台盟华北总支部成立会的文件(楊克煌起草，用謝雪紅名义發表）上，自称为"我們偉大的領袖謝主席"。她的亲信还在会上动員群众向謝"致敬"，高喊"偉大的台灣人民領袖謝主席万岁！"在这次批判会上有人对此提出責問，謝竟回答說："对我喊万岁是需要的，自然的"。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謝准备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她印了一百多張照片，打算沿途分送。后来出国未成，她对人埋怨說："很可惜，差一点兒我就成了著名的国际人物了"。

謝雪紅的野心就是要做台灣"女皇帝"。为了滿足这个野心，她主張台灣"自治"，"台人治台"，实际即要台灣独立。

她把台盟当作达到自己野心的工具，以台盟代替党。因此，她坚决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罪恶活动。

三、斗爭中的态度

台盟总部整風領导小組召集各地方組織代表和在京盟員在北京批判謝雪紅，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到十二月八日，举行大会十五次，小会五次，共二十次会議。开会时間約一百小时（預备会議不算），謝發言为自己辯护达二十几小时。

謝的态度十分恶劣，不断对群众进行侮辱和威胁，問發言的人姓甚名誰，指名叫駡，說批評她的人將有"后果"（报复之意），拍桌子，瞪眼睛，打茶盃，一再向会議提出抗議。

她不承認事实，在人証物証俱在面前，仍然是一概否認，她說："我撒謊，你們也得听"。她蛮不講理，她認为她一点也沒有錯誤，只有太相信沈毅是一个錯誤（因为沈毅起义，大胆地揭露謝的罪狀）。她說："我就是瘋狗，我要咬人"。你們要我承認錯誤，"办不到，办不到"。

第二次大会以后，她就逃跑不来，說："随你們怎样处分，我都不来"。中央統战部批評了她，才繼續参加会議。群众問她为什么逃跑，她說："我是一个党員，不能受侮辱，我逃跑是为了爱护党"。执行主席重新宣布："不管謝雪紅是一个党員，党員犯了錯誤，同样要檢討認錯，和非党群众一視同仁。"要求在座共产党員表示态度。在座共产党員都站起来，表示拥护党的政策。只有謝雪紅坐着不动，表示反对。

当楊春松同志揭發她出卖同志的历史时，謝竟駡楊会絕子絕孙。江文也批評她，她駡江將不得好死。沈毅揭露她，她駡沈沒有良心。

最后一次会，謝不但不承認有任何錯誤，並且公然反扑說："全場的人，全体盟員，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斗爭結束后，謝造謠說这次斗爭是台盟反动派要夺取她的領

导权。她对周华説，“她要活到台灣解放以后，再作清算。”

四、結論

謝雪紅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

她虽然在年青时参加革命，並受到党的培养，但在一九三四年已經自首变节，做了叛徒。她出獄后，即墮落为商人，並与日本特务往来密切。日本投降后，她加入国民党为特别党員，作各种政治投机，極力向上爬。她的政治关系是复杂的，她的政治生活的历史很多是骯髒的。

謝虽然出身于貧苦家庭，受过旧社会的压迫，有其反抗性的一面，但在她的几十年的生命中，做地主妇，經营書店，做洋貨店和酒家的老板，很大部分时間过着資产阶級的生活，習慣于投机取巧，买空卖空。她的身份和思想，都是屬于阶級异己分子的。

謝雪紅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和政治野心很大。在台共时代，她就以一个独立党的唯一領袖自居了。日本投降以后，她在台灣就反对地下党的領导。她認为她始終正确，只有她才是“台灣革命”的領袖。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起义，給她一个投机的机会，回大陆来就背着二二八英雄的招牌。在香港組織台盟，她担任主席职务，她認为这是她一貫正确的胜利。回国参加人民政协以后，她的野心就大为膨脹了。她以一个党（台盟）的党魁身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出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她以党魁来向党要价，来对抗党。她“代表台灣人”，利用台灣人来向国家要价，来对抗祖国，实际即分离祖国。她狂妄自大，唯我独尊。

謝雪紅这种野心，反映了台灣地主資产阶級反动派的思想。台灣地主資产阶級反动派是对帝国主义妥协的，現在是和蔣介石合作的。虽然所謂台灣“地方实力派”和美蔣也有矛盾，但是他們根本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他們的代表之一廖文毅，就主張台灣人是一个民族，应該独立。在美国豢养下，廖文

毅在东京組織所謂台灣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总統。謝雪紅是台灣地主資产阶級反动派在我們党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內部的代理人。

在目前解放台灣的斗爭中，謝雪紅的政治主張，例如台灣人是一个“独立民族”，台灣应該“自治”，台灣有特殊性等等，完全有利于美国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陰謀，在客观上，那就是不要台灣解放，不要台灣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这点上，謝雪紅又是在我党和我国內部的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就謝雪紅整个历史来看，她並沒有过好民主革命关，她投降过日本帝国主义，参加过国民党，在二·二八起义中又写信給蔣經国要求寬大处理，在华东土改中，又表現立場不稳，謝雪紅对民主革命的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官僚資产阶級，地主阶級，都作过投降或妥协。謝雪紅混过了民主革命关，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就混不过去了。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資产阶級的，而謝的立場却站在資产阶級那一边。她支持資本家、又是反革命分子的林政汉陷害七名工人为反革命分子。仅举这个例已足够証明謝的立場站在那里。社会主义革命，对資产阶級分子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謝雪紅却反对这种改造，她誣蔑三反五反运动，不断为不法資本家进行翻案。謝雪紅和国內其他右派分子一起反对党的肃反政策，不要無产阶級專政的巩固和發展，她也是要在中国复辟資本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就完全是一个資产阶級右派分子。

她从資产阶級个人野心出發，企圖建立資本主义的台灣王国，使台灣离开祖国，离开社会主义。

党对謝雪紅做过長期的教育工作，从一九五一年起，就对她进行批評和帮助，指出她的錯誤，提出警告，並採取过一些措施，耐心等待她的覚悟。但是謝对此不但不感激，而且更加仇恨党。她还以为她是台灣人的“領袖”，台灣尚未解放，党对她無可奈何，因此，在党整風的时候，她便乘机向党猖狂进攻。

右派分子謝雪紅是一个叛徒，是混进党的阶級異己分子，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其为害極大，屢教不改，把她开除出党是完全正确的。

中共农垦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刘培植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

刘培植，男，現年四十三岁，陝西省宜君县人，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三三年参加共产党。全国解放后，曾担任东北人民政府林業部副部長，代理部長，农業部国营农場管理总局局長，农垦部部長助理，党組委員，党委書記等职。

刘培植虽入党多年，但在历次运动中一貫思想右傾，对党中央所决定的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派斗爭，抱抵触情緒，持消極应付态度。他在一九四三年在延安的审幹肃反运动中受过审查。甄别后，組織上給他作了無政治問題的結論。但从此他就对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右傾思想。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他不但不积極領导运动，而且对当时組織上积極开展运动的要求，坚决对抗。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时，他放棄了对运动的积極領导，而把大部精力放在追求个人名利的事情上面。在整風运动的初期，大肆活动，支持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爭中，农垦部党組先后組織了11次大小会議，对刘培植进行了斗爭，根据所揭發並查对屬实的材料，刘培植的主要的反党事实如下：

（一）在大鳴大放时期，向民主党派的右派投降，答应他們發展組織和参与領导的要求。

关于發展組織的問題，他在六月的民主党派座談会上說："各党派要發展独立組織，党同情、支持、帮助"；会后又分别指定人出大字报和通知民主党派成立支部，在給部領导小組彙报时說："要尊重他們民主党派發展組織的要求"，在九月的斗爭会上几次地說："民主党派大發展是客观趋势，答应他們發展，到現在我还不認为是錯"。

关于答应右派分子要求参与領导的問題，他在去年六月的民主党派座談会上說："党領导民主党派，参与發动群众"，"領导决定，难免主观"；当右派提出"对部的大問題，要参与共同研究，不是形式的。要从彩排到表演，从設計到施工，都要参与"时，他馬上补充說："还应当加上驗收"，並說"每时期的中心工作，中心任务，全面性的，关鍵性的，群众性的，政治、經济問題，都要大家研究"，"各民主党派参与領导，达到团結"；在給部領导小組彙报时說："在两次会議上，已解决了如何建立制度来經常联系他們来参与領导"，並建議部領导上考虑讓民主党派参加某些部务会議和党内的会議，在斗爭会結束后的十月，他还坚持地爭辯說：我始終認为，凡屬方針政策性的大問題，都应当和民主党派共同决定"。

（二）在历次运动中的思想和言論：在"三反"运动中，他揚言要"保护好人"，"为党保存幹部"；在肃反运动中，他为对人民有血債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肃反对象馬宗援辯护，說馬是"杀人未遂"罪，並說"如果把馬宗援算做坏人，那么95%里就沒有好人"又說："要知道，在运动中保护好人是多么不容易啊！"；在反右派斗爭初期他說："农垦部沒有右派"，斗爭他的过程中他一再辯护說："当时我就沒有感到右派的进攻"，甚至狂妄自得地說："我在历次运动中，总是自己定一个弦"。

（三）由極端个人主义野心發展至反农垦部党的領导：長期以来就想当副部長，一九五三年由东北調北京后，向中央組織部

提出要求当副部長。在农業部当局長和在农垦部当部長助理期間，散佈了不少詆毁領导的坏話。整風开始后，丑化王震部長的历史，說王部長在革命战爭中被国民党軍队打得"丢盔撩甲"；攻击王部長亲自領导的密山垦荒工作，不讓别人支持密山，專門搜集密山工作中的缺点，散佈密山垦荒計划註定要失敗的空气；大鳴大放中，力圖把整風的鋒芒引向王部長，以若隐若現的手法在群众中煽風点火，企圖赶王部長下台，背后罵王部長說："这样的人怎么能当部長，还不赶快滚蛋"。

（四）目無組織、目無紀律。妄改和詆毁党的方針政策。如关于国营农場的方針，中央早已規定是"提高产量，降低成本，积累資金，示范农民"四項，但他却因若干农場不賺錢而提出"少办、小办、办好"的所謂"方針"。並把农場不賺錢归咎于农業合作化，說："农場成本高是农業合作化高潮帶来的"等。

以上事实說明，刘培植的極端个人主义思想已發展到極其严重的程度，他对抗党的領导和运动帶有一貫性，这次整風运动，他支持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出讓党的領导权，反对农垦事業的方針。並且堅持錯誤，拒絕改造，斗爭会上惡劣蛮横，抵賴狡辯。因而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員的起碼条件，墮落成为一个資产阶級的極右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根据中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經支部大会及部党委通过，开除刘培植的党籍。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軍总政治部本部委員会关于陈沂問題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

陈沂任总政文化部長期間，在工作、思想、品質、作風等方

面都表現了許多严重的缺点和錯誤，总政首長对此曾不断地給以批評教育，但他不檢討、不改正，有时表面作些檢討，但檢討之后依然如故。一九五三年总政根据軍委指示檢查文化部工作，一九五六年底又对他的严重的無組織、無紀律、舖張浪費等錯誤进行了揭發批判；他对此均採取了惡劣的抗拒态度。一九五七年春季，軍委决定文化部併入宣傳部，他对此十分不滿，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一九五七年五月初，他和社会上右派利用整風机会猖狂向党进攻一样，在天津师范学院和总后第四預备学校放火（后者有录音），在講話中散布了許多反动言論，攻击中央軍委及解放軍各总部。一九五七年六月，他抓住馬寒冰自杀事件，挑撥是非，攻击总政領导。在整風中，他对一切批評过他的人进行打击，並企圖將这些人說成右派；而对右派或有严重右派言行但未冒犯过他的人，則一律加以支持保护並設法为之开脫。陈沂的这些表現，总政領导和机关幹部早有察覚，在整風中，有不少幹部对他提出批評。因此，机关党委根据机关党代表大会上代表們的提議和总政首長的指示，召开会議，对他进行批判教育。会議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起，先后举行过二十五次，在会議上發言的共有七十七人，揭發了大量的材料，証实陈沂有如下的罪惡活动：

一、惡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八兩日，他在天津兩个学校的講話中發表了許多反动言論，惡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他宣傳阶級斗爭熄灭論，反对人民民主專政。他歪曲毛主席在浙江省委的講話，他說：“毛主席講……反革命只有十万分之一，浙江省二千三百万人中只有二百三十个反革命，其中还有些是地主坏分子受管制的”。他說：“今天什么家庭出身的都不成問題，因为他都改造了么，他爸爸过去是資本家，現在也是自由劳动的人嘛！”他又說：“今天同志們也好，外边人也好，他对

我們沒有說非反对共产党不可。……他对你沒有什么杀父之仇，为什么非反对你不可呢？”由此，他得出結論，“如果对待这些善良的百姓，还是採取專政的办法，那就是蔣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办法，……那就是自挖坟墓。”

他誣蔑我們党过去对人民实行專政，並竭力說明党中央、毛主席所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被迫的，他号召人們以暴風雨的方式爭取对人民的民主。他說：“阶級敌人打倒之后，阶級关系發生了根本的变化，剩下的問題就是人民自己之間的問題，“我們还是要專政，对人民实行專政，採取压服的办法，……还是採取蔣介石的办法，那就是說我們也为我們挖坟墓。”他說毛主席、党中央所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和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問題已經擺在党的面前，很重要的問題，不这样办就不行了”。“問題不解決，就会發生斯大林的悲剧，就会發生象匈牙利这样的事变！”他很惋惜地說：“根据毛主席自己講，他提得晚了一些。这事情本来就应該比現在早一点提出来，但是提晚了一点”。他又說：“現在提出来也很好，再不提这个問題就多了。”他說問題所以严重，是党內絕大多数人現在还不願这样做。他認为：“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是講我們党同人民之間的矛盾，我們党同人民現在是隔了一道墙”。“这个墻如果不拆开，关系就搞不好”。“我們現在整風就是为了拆这个墻”！如何推倒这个墙呢？他說“不要强調和風細雨。”他認为强調和風細雨“那就是不讓人家来”，他說“和風細雨中間总要打打雷吧！总要有几个閃电吧！那有一来就是和風細雨，沒有这个事情！”“誰喜欢暴風雨，那就来吧！”“你就敞开門放就是！你要怎么进就怎么进，窗子都打开，你們……随便！”“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么，不准附加任何条件！”他說“搞民主就要帶点强迫，你說一点强迫沒有，他民主不下来！”

关于匈牙利事件，他作了与党完全相反的分析。他認为匈牙

利事件主要的不是帝国主义和內部反革命長期陰謀活动的結果，而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他說："如果那时匈牙利人民已經在街上示威的时候，如果那时匈牙利的党看到这个問題只是人民內部的問題而採取措施，也还是可以的，因为那时工人的口号就是这样的，'示威生产兩不誤'，証明他还是要搞生产……就是因为那时党的領导还是採取压服的办法，所以激起群众的义憤，这时反革命在利用，当然也就發生了匈牙利的問題。"他的論点同納吉等同出一轍。

他咒駡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号召要改朝换代。他說"我們国家社会制度有很多还要研究，这也是要鳴的。"他說："匈牙利事件向我們提出一个問題，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灭亡。"他又說："社会主义經济基础是好的，而上層建筑太坏了，就要改朝换代，不然，为什么同是封建主义經济基础，而换了那么多朝代呢？"他留恋私有財产制度，仇視农業合作化，他認为在我們的国家里，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軍人的命运是悲慘的，他說："咱們这些当兵的，解甲归田，無田可归，告老还乡，無乡可还……。他回了家以后，成了高級合作社，他啥也沒有，房子沒有他的，什么也沒有他的，……这就是矛盾。"

他誣蔑社会主义民主，宣揚資产阶級民主，並提出向資产阶級民主学習。他說"我們国家沒有經过資本主义，所以我們的生产力發展受到影响；当然我們因为也沒有經过資本主义，我們的民主生活鍛煉也是差一些。当然資本主义是那一套，可是他有些也值得我們来学的，你比方說他互相可以駡么，比如在这里开会，我对你有意見，我就不同意，我就可以站起来質問你，我就可以写文章公开批評你，这也是一个培养哩！我們就沒有这个。因为我們常常是講人家，我們总是正确，我們就是領导人家的！"他主張無条件的言論自由，他說："知識分子揭穿了，他就要求言論自由……他不要求别的东西，那么，你就应該滿足他，但是你不讓他說，……就会發生对立！"

他公开提倡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並視为这是个人积極性的来源，認为誰批評个人主义誰就是教条主义，就应該加以反对。他說我們党和軍队总是强調为人民服务，为部队服务；但"对人家的特点，根本不考虑，尤其对人家的前途不考虑。"他說："他現在当医助，当衛生員，当护士，当司葯，难道他能当一輩子？他是要想到我將来会当个医生，甚至会当个大医生。他当然要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有什么錯呢？""人沒有理想怎么活呢？"他說："老实說，那个沒有点个人打算呢？……說一点个人打算都沒有，那是騙人的，是不老实。"

二、反党反領导。

根据会議上的揭發，陈沂在总政文化部工作期間，反党反領导的錯誤表現得特别明显，而一九五七年則更有了惡性的發展。

他看不起領导，一貫地破坏領导威信，他認为領导上不懂文艺，不关心文艺，不爱护文艺幹部。他在文艺幹部中广为散布："彭总只爱看斬馬謖，根本不懂新文艺！""彭总說，文化工作少搞点，亡不了国！"借以煽动文艺幹部对軍委的不滿。他十分蔑視总政的几位主任，他經常說："主任不懂文艺特性"，"主任不懂裝懂！""你不懂就放手讓別人幹嘛！"为破坏几位主任的威信，他不惜制造謠言，把主任們描写得十分無知。他罵譚主任"主观、片面、狹隘，从不重視文艺工作。"罵傅副主任"老糊塗了"，罵肖副主任"胆小怕事，他懂得什么文艺？"罵甘副主任是"山溝里出来的，無知！我連尿也不尿他！"他对中央宣傳部、国家体委的一些負責同志也是看不起的，他說周揚同志"搖搖擺擺，对貫徹中央的文艺方針不坚定！"罵蔡树藩同志是"惡霸"荣高棠同志是"流氓"等等。

他驕傲自大，个人突出，爭名夺利，玩弄权术，个人主义已發展到和党的領导直接对抗不能相容的地步。他把他所領导的文化部門当成一个独立王国，只能向党向上級要支持，要人要錢，

不准党和上級对他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批評。总政几次檢查文化部的工作，他都採取抗拒的态度。他經常对自己的部屬講：“对上只有抗、頂才能解决問題！”总政領导上說文工团演“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一剧用款近兩万元，有浪費，他不但不作檢查，反而奬他們一千元。总政領导上說文化部工作中有缺点，他就布置文化部各处把成績都摆出来給領导上看看，趁机大作宣傳。总政領导上說他决定解放軍代表队不参加全国奥林匹克选拔賽是个严重的錯誤，他就說“虽有缺点，但体委也不对！”总政領导上說用人要經过組織手續，不要随便从外部吸收人，要照顧下面的困难，不要随便从下面調人借人；但他可以不經組織批准，就自行任命文工团十几个校官的职务，从社会上招收人，並經常从下面調人，調不到就借，而且往往有借無还。总政領导上說經費开支要遵守制度，但他却無組織無紀律不請示报告，就随便批条子、乱花錢，一而再、再而三。一九五四年他帶文工团出国，很不尊重我駐外使节的領导，他对我駐苏使館关于不唱“斯大林頌”及不以“东方紅”作礼仪性首唱歌曲的指示，採取抗拒态度。他自己想延長在捷克的时間，不經国內及我駐捷使館的同意，即向捷方提出要延長在捷时間，而向我使館报告时，則又說是捷国防部長提出的要求……。总之在他的心目中是沒有什么上級和党組織的。

他为打击領导威信，抬高自己，总是标榜自己如何关心大家，他常常对下級这样講：“你們大家好好幹，有什么問題我給你們頂着，为了你們，我已向主任不知作过多少檢討了。……你們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我能办得了的就給你們办，我办不了的就給你們往上轉，我上边还有主任啊！那我就决定不了啦！”为了拉攏群众，他对下面提出的要求，不論合理与否，都随便許願；但当領导上不批准时，他就把責任推到領导身上，表示他是关心下面，就是領导上不关心。他特别强調文艺的特殊性，認为各級政治机关的負責人不懂文艺，領导不好，因此就强調部門領

导，强调他的領导，强調为文艺工作爭地位，强調文艺工作应該当作一个兵种来建設，而自己則以軍队文艺工作的最高領导者自居。他把自己关于文艺工作的一些报告不經請示便編輯成册，在部队中广为散發，並在序言中說："这些文章可以作为有关部队文化艺术工作指导思想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閱讀，来理解"。他多方面地迎合与支持文艺幹部中的錯誤思想，並常常煽动下面向总政、軍委，以至中央写信，然后他就以"群众意見"、"群众輿論"的代表者的資格来和領导上对抗。他常向下面的人講："我沒有意見，但我上面有主任啊！你們回去写信么，我給你們轉！帶点情緒也沒关系！""你們写信来，我就好說話了！"

他的这种反党反領导的活动，在1957年發展到了頂点。最突出的表現在以下几个問題上。

1957年春，根据軍委决定，总政文化部併入宣傳部，他在总政部务会議上說："軍委决定了，我沒有意見，堅决执行，合了只有好处沒有坏处，我們已經作了合併的准备工作。"但在暗中，他却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到处說什么"宣文合併，根本不征求文化部幹部的意見，是主任对文化工作最大的粗暴！""宣文合併是一种倒退現象"，"讓主任們对历史負責吧！历史会証明这一决定是錯誤的！"部队这样对待文化工作，中央知道了一定不会同意！"他惡意歪曲主任的話，煽动幹部对主任不滿，他說："人家譚主任講了：宣傳部有思想，文化部有工具，我們幹了这多年，成了沒有思想的工具了！""什么宣文合併？还不是为了整我陈沂？""陈沂有毛病，就撤陈沂的职！为什么把一个部取消？"当文化部的一些幹部在他的这种煽动下，由对宣文合併有不同意見轉为不滿意时，他的反党反領导的活动便更加囂張，到处散布散伙情緒。他說："文化部的黃金时代已經过去，現在是沒落时期了。刘志堅是个取消論者，……部队文艺工作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了！""走！大家到地方上去，这里不要

有人要！”“部队文化工作的路是越走越窄了，部队文化工作算是叫譚主任踢蹬光了！”“有些成就的人都要离开部队了，今后部队还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我們一走，文化幹部就散了。”他在散布了这一些散伙情緒之后，便积極进行分裂活动，具体地安排从部队中拉一批人随他到地方上去。他不經总政同意，便派陈亚丁、魯勒、馬寒冰三人去中央文化部談关于部队文艺幹部的安置問題。对文化部的一些主要幹部，他分别对象，用有拉有打的办法，鼓励他們离开部队。他对陈其通同志說：“你是搞戏的，可以到戏剧学院去么”当陈其通同志表示願留部队工作时，則又諷刺地說：“人家当然不走啦！宣傳部副部長么！主任喜欢長征幹部么！”他对李偉同志說：“你可以到音乐学院去当副院長。”当李表示不願离开部队时，他就对人說：“李偉他是不願丟軍銜的，軍队薪金高，他是很計較这些的！”他一再鼓励董小吾同志到地方上去，並表示董可以到实驗話剧院当副院長，当董到总政話剧团工作后他就对董說：“到話剧团当副团長？小吾啊！你眞窩囊！”他造謠說：“总政在安排幹部时，已决定把陈亚丁調出来轉業”，“譚主任对陈亚丁印象不好，”借以煽动陈亚丁同志离开部队。当陈决心留軍队工作时，他就說“陈亚丁驕傲了”此外，他还对不少的人进行过这类活动。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把部队文艺工作拆垮！以証明軍队离开他，文艺工作就幹不出什么名堂来了；証明軍队領导上有問題，他一离开，所有文艺幹部都团結不住了。这个时期，陈沂为了說明他是“吃得开”的幹部，曾到处吹噓自己，說中央及軍委先后为他安排过十多个重要职位。一是上海市委書記分工管文教，並說“我看比夏公（夏衍）可能管得好些！”二是中央文化部副部長，他說：“人家都說我陈沂有火力，去后，象中央歌舞团等，不多久就可以整好！”又說：“到中央文化部当副部長，我可不当刘芝明那样的副部長！”三是中央对外文化联絡部副部長（或中央对外文化联絡委員会副主任），說：“周总理已同意，韋明同志已經打电話

通知我了！”四是空軍副政委，他說：“我不想幹，沒意思！”五是砲兵副政委，他說：“主要是考虑我和邱創成的摆法問題。”六是軍事科学研究部政委；七是解放軍报的总編，並把解放軍文艺、解放軍战士、解放軍三十年編輯部都帶过去；八是把总政所有报刊合併成为出版部，他当部長；九是总政宣傳部長；十是貴州省省長，他說：“你看滑稽不？叫我当貴州省長，一定是周林搞的鬼！”

在宣文合併前后半年多的时間里，陈沂除自己进行反党活动外，还拉攏一部分人帮他反党。据宁干、陈亞丁兩同志揭發，在当时的文化部存在着一个以陈沂为首的小圈子，在这个小圈子里的人积極維护陈沂，到处为他說好話，替他隐瞞錯誤，甚至支持他的反党活动。这个小圈子的核心是陈沂、馬寒冰、魯勒等。他們講朋友义气，提倡“士为知己者死”，追求資产阶級的生活方式，大吃大喝，彙集並散布流言蜚語，維护陈沂，謾罵領导。有人說这个小圈子很象个“裴多斐俱乐部”。

1957年5月8日他在天津总后第四預备学校的講話，除系統地發表了許多反动言論外，还集中力量攻击了軍委和解放軍各总部。这是他反党反領导又一次集中的表現。

他誣蔑軍队不敢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和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他說：“我們軍队还是在这个問題上不放手、不敢、怕！……就是怕提反对意見。”因此，他号召大家“要求爭、要求鳴。”

他誣蔑我們軍队已經完全脫离了群众。他說：“我們軍队进城以后，……知識分子不来往，农民不来往，工人不来往，作生意的人更不来往，要来往就是搞点东西。这个东西就很危險啊！这是脫离群众！”

他誣蔑我們軍队毫無民主气息。他說：“这些年来强調正規化，强調軍官、士兵、將軍、校官、尉官，强調这些东西，强調‘奉命来到’，这样确实把我們的关系弄得相当疏远。有时候是

假的。”又說：“本来我們部队官兵关系是最亲密的，現在弄得是有点格格不入。”又說：“尤其是我們軍队，又是首長制，命令，前一时期还在强調‘單一首長制’，就叫作‘首長是神聖不可侵犯’！这当然就沒有法子容易听人家反面的話了！”

他誣蔑我軍到处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已統治一切。他說：“我們关在营房里边訓練，关在学校里学習……这样关起門来搞的結果，同人民不接触，同国家社会不接触，那我們只有搞教条主义，除了教条主义还搞什么！”就連批評个人主义、批判富农、富裕中农思想他也称之为教条主义。

他用尽心机，不惜制造謠言来丑化軍委及各总部的領导。在他的描繪下，軍委及各总部的官僚主义已經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他造謠說：1957年軍委确定所有尉官不發衣服，甚至連战士、班長都不發，只是遭到全軍反对才又發了；1957年規定尉官都不晋級，1956年是行不行都往上提，1957年就一律不动；1957年規定所有复員軍人都要处理完，就給海空軍造成了麻煩……等。他在制造了这一系列的謠言之后，就給軍委和各总部加了許多罪名，他用責备的口气說：“这不是自我矛盾？本来这些事情就不合理，你非要这样主观主义的規定！”“这矛盾不是制造的更大嗎？”“都不对头么！”“你們安排这些事情就是太随便了一点！”“还了得！”“你不考虑得周到一点，一下子硬往下推，下边眞受不了！”“我們軍队象这类事情簡直相当多哩！这怎么不会有矛盾呢？”为什么軍队会是这样的乱七八糟呢？陈沂的回答是：“这是彭总講的，首先是軍委嘛，軍委有責任，軍委要考虑这些問題，領导机关有責任，所有这些都是要經过批准的么！”

1957年6月底陈沂又利用馬寒冰自杀事件进行了一次大的反党反領导活动。

从会議上許多同志所揭發的事实来看，馬寒冰是一个政治品質、思想作風很不好的人，和陈沂气味相投，所以陈对馬十分器

重，使馬一身兼三职。馬的許多錯誤他是知道的，但都包庇下来，並且慫恿他。馬对党內斗爭的看法也和陈一樣，認为党內斗爭就是个人恩怨，就是宗派斗爭。例如：1955年馬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看法，就認为是宗派打击。因之当总政决定馬不帶青年艺术团出国留下整風时，馬即認为党內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黑暗势力要想把他整倒，对党極度不滿，因而走上了叛党自杀的道路。馬在自杀之夜，曾在陈沂家中說了許多对总政領导不滿的話，当时陈沂对他不但不予教育批評，反而火上加油，和馬寒冰、魯勒共同發泄对总政領导的不滿。根据魯勒、李偉同志揭發，陈沂当时沒說过一句正确的話，所有的話都是攻击总政領导，目的是为了抵抗总政的决定，爭取改变这一决定。如，他曾說：給馬提意見的人是小人，是人身攻击，是报复；秘書处印發材料是破坏人家的名誉；主任們主观，偏听偏信，……等。馬自杀后，他就利用当时文化部一些同志因不了解情况所产生的一些不滿情緒，在文化部掀起一个反領导的風浪。他在馬寒冰的尸体面前宣誓似地說："我要控告！"他向許多人講："总政首長偏听偏信，是官僚主义逼死人！"还說什么"总政首長到該接受些教訓的时候了"他贊揚馬寒冰是"詩人气質"，並說："士可杀不可辱""老馬早就說过，不定什么时候来他个尸諫，"將叛党者比为屈原，把領导比为暴君楚怀王。当总政召开幹部会討論馬寒冰自杀問題时，他曾暗中对人說："这是譚主任心虛，想把事情压下去！"会議上很多人發言說馬的自杀是叛党、叛变革命，他就說："这眞是十足的教条主义！"而对于个別在会議上因馬的自杀公开攻击总政領导的人，則倍加贊揚；当会議上有人批評陈沂是別有用心时，他暴跳如雷，揚言："再这样，矛盾的性質就要变了！"陈沂上述这些話不仅向軍內外的一些幹部講了，而且也向馬寒冰的妻子張玉蘭講了，並造謠說："告馬寒冰的韓淮是右派"，使她在痛苦之余，又加上对总政首長的不滿，要向軍委、中央和周总理告狀。

三、在整風中压制鳴放，支持与袒护右派分子和有严重右派言行的人，把斗爭的矛头指向总政領导。

陈沂在一九五七年整風开始后的第一次鳴放时期，企圖把斗爭鋒芒引向总政領导，他曾說："我們的教条主义算什么！我們又决定不了問題，主任那一关打不通，鳴放半天什么問題也解决不了。这次鳴放如再冲不动官僚主义，部队的文艺工作就沒有希望了！"当解放軍报社召集文工团幹部开座談会时，他很兴奋。在会議上有不少人对总政、軍委在文艺工作領导方法进行了攻击，他兴高采烈地对別人說："看主任怎么处理！"並向原他的秘書張仲彬等同志說，你們可以写信給毛主席，請主席用几分鐘的时間听一下这个录音，那怕几段重要的也好！他的"文艺杂談"犯了"左傾"教条主义的錯誤，毛主席批評了他，但他不檢討，反而写文章把責任推向总政領导上去，此文肖副主任未讓發表，他对此不滿，認为一到主任那里就批評不得了。解放軍文艺社召开座談会，会上对他的文艺思想上的若干問題进行了批評，他暴跳如雷，說"我这个部長还沒有撤职！"說座談会是"缺席审判"，並到編輯部大吵大鬧。当会議紀要發表后，他就打电話給解放軍报社、总政宣傳部、解放軍文艺社、人民日报社提出質問。一九五七年六月，他曾以"冬今"的化名写了一篇"胡可的疙瘩可以解开了"的文章，在"解放軍文艺"七月号上發表，假借第三者的身分来抬高自己，討好胡可，打击領导；並动員宁干同志按照他这篇文章的方向来写文章，企圖把斗爭的矛头引向总政領导上去。当別人發覚这篇文章是他写的以后，他便打电話罵解放軍文艺社的編輯，說編輯泄露了他的底是違背了編輯人員的道德。

在整風反右斗爭中，他对向党进攻的人表示同情、支持，並为之开脫。天津师范学院有个右派分子写了一篇"狂人日記"，最露骨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陈沂在該院講話时，非但不加

批評，反而称贊它，說写这篇文章的人有才，应該支持；認为学院批評这个人是大惊小怪，是教条主义。該学院的右派分子要办同人报，他表示同意，並要学院拿几千塊錢給以支持。一九五七年六月底，他在錦州对三个文工团講話，挑动文工团員不滿。当时文工团員李国权說："亲爱的陈部長，你是偉大的太陽，我們是在太陽底下把冤伸！"他听了这些話洋洋自得，加以默認。他自反右派斗爭开展以来，曾在各种报刊上發表过十几篇反右派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目的，一是表白自己是左派，二是借反右派之名，將触犯过他的人一律按右派打。最明显的是他曾散布謠言說"魏巍有問題"，"杜烽、胡可同徐光耀是小集团"，"虞棘肃反中有問題"，"韓滙是右派"等，並經常督促别人去整这些人。但他对有严重右派言行的人，只要沒有触犯过他的，則予以同情，並帮助他們开脫，認为这些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于个人恩怨打击报复。說"文化部的一些人所以有了問題，还不是宣傳部为整我們召开了那么多座談会才冒出来的！"並曾感嘆地說："唉！都成了右派了！"当文工团丁里、胡果剛、史行的反党言行受到批判时，他就說这是由于陈其通同志的打击报复。他給丁里打电話說："丁里！你在家里幹什么？無事改改你的剧本吧！你的錯誤就是不积極嘛！"和胡果剛本人及其他一些人講"胡果剛反陈其通就反陈其通嘛！为什么老談領导領导的！"他又說"史行是忠心耿耿的"。宣傳部的黎明和創作室的白樺錯誤严重，但他偏說："黎明有什么問題！为什么老按着他斗呢？"並阻止白樺回云南整風。

四、品質作風十分惡劣

陈沂經常对他亲近的人講："你們年輕，在党內生活的时間短，不懂得党內斗爭是怎么回事，这一套我了解！"在他的心目中党內生活是沒有是非、沒有原則的人事关系，党內斗爭就是个人恩怨。因此，他就很注意机巧权术。他惯于制造謠言，挑撥是非，制造矛盾，又利用矛盾，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拉拉扯扯，

吹吹拍拍，並用一切办法給反对他的人以报复打击。

他慣于造謠說謊。他經常向別人講，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这个元帅、那个元帅曾对他說过什么，指示过什么，借以証明他自己正确，中央、軍委的領导同志支持他。因中央、軍委首長有很高的威信，同时他以傳播的話，下边也無法核对，自然信以为眞，但事实証明很多是他在造謠。例如許多人批評他提出的部队文工团以歌舞为主的方針不妥当时，他就造謠說："罗主任說了，以歌舞为主的方針是正确的"，又如，总政几次部务会議決定，罗主任当时也指示他將京剧团交地方，但他拒不执行，反而造謠說："罗主任是不同意京剧团交地方的！"一九五四年他帶文工团出国，他向国內請示要求將外国發的零用錢匯回国內解决个人困难，总政及外交部复电不同意，他就發来一个說謊的电报，說"剩余的款項留交了使館"，但实际上將大批的錢分光並匯到国內来了。他为了攻击某一个領导人，他什么謠言都可以制造。例如他說："我和譚主任在东北时期就有爭論，我是拥护正确路綫的！"肖副主任因他下令解放軍代表队拒不出席全国奥林匹克选拔賽，在体委会議上严格地批評了他，他就造謠說："肖主任冷酷無情，临走时連个車也不讓搭！"傅副主任因他在"同志間"剧本演出問題上表現了兩面三刀的态度，批評了他，他就对李偉同志說："傅主任对你非常不滿意，你为什么在邀主任上台祝賀演員时，不讓他第一个上台呢？人家可注意这些哩！"

他慣于挑撥离間，播弄是非，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例如他經常給他的下級講："我是关心你們的，能办都办了。但我上面还有主任啊！"一九五三年軍委決定由甘副主任檢查文化部的工作，他就趁机造謠挑撥肖、甘兩位副主任的关系。他对主持檢查的刘其人同志講："老刘呵！肖主任对这次檢查很不滿意，他給我說，叫他們檢查去，反正杀不了头！"他对其他一些同志講："什么檢查文化部工作，还不是甘主任为了整肖主任，是我陈沂

替他挨了！”当検查結束，肖副主任在会議上批評了他的驕傲自大、自由主义、無組織無紀律之后，他在会后对許多人講：“你們不了解，肖主任批評我們还不是为了給甘主任下台阶！”他为了挑撥傅副主任与其他几个主任的关系，他对人甚至在会議上說：“傅主任很博学，也关心文化工作，就是說話不頂事！”“他批了的东西也不算数，秘書处还得拿到別的主任那里批！”他为了攻击譚主任，就散布說“譚主任把总政老部長都排挤走了，都提了他的一些人！老部長們对此都很有意見！”他对不少人說“譚主任周圍有一批小人，專門找別人的缺点，你們可小心呵！”內蒙軍区文工团編制三十人，本系根据文化部的意見确定的，后来內蒙軍区要求將三十人扩編为六十人，他不經总政同意就私自答应了，也从未向領导上报告过。但当內蒙請示总政，总政不批准，內蒙軍区有个幹部給罗主任来信表示不滿时，他就在信上批上这样挑撥性的字句送給罗主任，“这个問題不是一般問題，而是一个民族問題，我多次提出，但領导上总不考虑，我覚得象这样的事，不讓你知道也不好。”他对彭总不滿，就在文工团軍衔問題上进行挑动。他对文工团講話說：“不知怎么文工团的軍衔就沒有了，这事連彭部長都不知道，我曾把这事反映給彭部長，彭部長說‘为什么文工团沒有軍衔，这是誰下的命令？’我說还不是你国防部長下的命令？”他对他的下級也是如此，总是兩面态度，逢甲說乙，逢乙說甲，造謠挑撥。例如：丁毅同志由中南調来总政时，他就对陈其通同志說：“丁毅在中南不知說了你多少坏話！他得了斯大林奬金后驕傲了！”“但他搞歌剧，譚主任是喜欢的！”而对丁毅同志則又說：“陈其通这个人难搞，我介紹你去当歌舞团長，他不要！”“你斗陈其通是斗不过的”，你搞你的，讓他搞他的吧！”

他是一个徹头徹尾的兩面派，他善于伪裝自己，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文章是一套，实际又是一套，对上是一套，对下又一套。他在一些文艺論文和講話中，表面是講要面向連队，为兵服

务，强調战斗性、群众性；但实际上却到处鼓励与支持文艺幹部的一些錯誤思想，鼓励他們当名作家、名演員，鼓励文工团專業提高，忽視普及工作，重技术，輕政治，並認为如果不讓文工团搞專業提高就是誤人子弟。他在表面上是强調文艺要写正面人物歌頌新英雄人物的，但却又鼓励"解放軍战士"的編輯們多写諷刺小品，扩大批評和諷刺的范圍，去批評和諷刺軍官。他表面写文章提倡民族形式，但对文工团研究民間歌舞則不支持。他敌我不分，包庇反革命，私人安插了那么多政治上不清楚的亲屬在部队工作，但却在肃反时一篇又一篇地發表文章，說什么"同老虎在一起睡覚是不行的！""帶槍的人应該学会怎样对待不帶槍的反革命"，並且号召大家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来正确对待自己反革命的亲屬。写了文章还不算，还要再把这些文章匯集起来印成小册子。整風中，他到处煽風点火，与右派一起瘋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但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發表反右派的文章，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左派。他犯了錯誤，在抵賴不过时就作假檢討；但檢討一过，則又故态复萌。他經常在檢討过后向別人講："反正我就是那一套，叫什么时候檢討，我就檢討，到什么时候你們不听了，我就不說了！"他为了攻击别人，表彰自己，常常用化名写文章。为避免別人識破他的笔迹竟叫自己的小女孩为他抄稿，易地投郵。

他善于鑽領导上的空子。他的手法是：凡是他的直接領导上級总政主任不同意办的事情，他就到更高的上級去鑽，鑽成了，就以此炫耀自己如何能幹。凡是这个主任不同意的，他就到那个主任那里去鑽，但絕不談前一位主任的意見，如果第二个主任同意了，他就馬上办，說主任已經同意了。如果第二位主任也不同意，他就到第三位主任那里去鑽，也絕不談以前兩位主任的意見。如果第三位主任同意了，他就办，說是主任已經同意了。他把幹部看成是若干不同的宗派，經常講某某人是那里来的，是那个老总的，誰喜欢他……等。当总政檢查他的工作或他遇到什么

批評，或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就把真象有意隐蔽起来，到处向高級首長进行活动。企圖鑽領导上的空子。一九五三年軍委檢查文化部工作时，他曾先后动員过董小吾找賀总，丁里找聶总，李偉找罗主任，陈其通找周总理为他說好話。至于动員一些文艺幹部給軍委、中央写信支持他陈沂的事情，那就更多了。

他对幹部是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極不正派的。平时对幹部的要求尽量給予满足，要人就給，要錢就批，幹部犯了錯誤，他为之袒护，想成名帮助成名，想出国帮助出国，因之有若干的人受他蒙蔽。他强調朋友关系，講感情义气，提倡“士为知己者死”。在他領导下的文化部，自由主义、無組織無紀律、謾罵領导是合法的；但这只能对其他部門对总政領导，而对他則是絕对批評不得的，对他的錯誤則更不能揭發，誰要是冒犯了他，他就可以抓住把柄加以打击报复。如董小吾在男女关系上有錯誤，平时他都知道，但不追究不处理，因当时董竭力維护他；但当董随文工团出国，向主任写信揭發了他在国外的一些缺点錯誤后，他就不顧总政“待回国后再处理董的錯誤”的指示，急忙在国外組織对董的斗爭，並声称董是反党反領导，是小高饒，力主开除董的党籍。

他在处理經济問題上，对公家的錢是“揮金如土”的，借以籠絡幹部收买人心。如八一队比賽得胜，他不是从政治上鼓励他們警惕他們不要驕傲，而是常常以大批的物質給以獎励。文工团員敎蘊瑜患病住协和医院时，他就專門为敎另僱两个特别护士，每人每日工資12元；共用去特别护士費1123元，据协和医院談，除美国石油大王的兒子住院时僱过特别护士外，还不記得中国人有这样办过的。自一九五二年“三反”之后，他不經总政領导同意，或用先斬后奏的办法，在供应处業务經費中先后批用了五十余万元，其中有很多是不应該用的。他的文章往往一稿几投，同时拿稿費，就連由别人代笔以他的名义發表的文章，稿費也据为已有。有时他的文章在报上剛剛登出，他就打电話要稿費。前面提

到过的他出的一本"把解放軍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的書，其中絕大部分是他在一些会議上的报告。这些报告大部分是文化部的一些同志起草后經过他修改，講过后又由其他人整理的。这些文章先在八一杂誌、文化工作手册和解放軍文艺上登了，拿一次、兩次稿費，然后再匯集成册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拿版稅，並用公家的錢印二万余份向部队分發。文化部長审稿本是自己分內的工作，但他一九五七年审閱了解放軍画报社的十一份圖片即收审稿費二百四十元。他公私不分，將公家的收音机、照象机据为己有，不仅一个，而是若干个，不仅自己用，而且当作私人禮物送人，甚至將兩个汽車輪胎、一架美式軍用收音机也想法出卖变錢。一九五四年他帶文工团出国，在他的主張下，違犯国家規定，浮报冒領了国內零用补助費五万余元，並將不該分給个人的一些演出收入也分了。他出国一趟夫妇二人除在国外买了电气冰箱、家庭洗衣机、吸塵器、小孩車、衣料等以外，回国后还落得現金三千九百元。

除上述四个問題外，会議上还对他的資产阶級文艺思想进行了揭發和批判。

陈沂的錯誤是严重的，但他在整風中态度却極不老实。开始时，他不願参加整風，当他的問題开始在文工团及机关党代表大会上被揭發，肖副主任通知他参加机关整風后，他就进行了一連串的非組織活动，他找了許多原文化部的人談話，在談話中，使用了不少威胁、拉攏、挑撥、离間的手法。他用威胁的口吻和別人說："反对我的可多半是右派啊！"在整風会議进行过程中，陈沂的态度也極为恶劣。开始时对别人的發言听不进，有时發脾气。十二月七日他作了檢討發言，他虽承認自己身上还存在着一些毛病，但对重要事实却不敢正視，或推卸責任。特别是一些大大是大非的問題，他都說成小是小非，或者根本沒有什么錯誤。他說他在天津兩个学校的講話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虽然有些地方不够妥当，但这只是由于他講話时不注意，是"信口开河"、

“禍从口出”。

根据以上事实，机关党委一致認为陈沂是一个極端的屡教不改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徹头徹尾的兩面派分子，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他驕傲自大，目空一切，抱有强烈的个人名利野心，因而他就把他所領导的文化部当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成为他获取名利的工具。他拒絕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評，抗拒党对他的領导和监督，打击任何妨碍着他的名利發展的人。所以，一九五七年，当軍委决定將文化部併入宣傳部，当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發起进攻的时期，他就很自然地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內外呼应反党、反領导、反社会主义，变成为一个党內的右派分子。

为了教育幹部，肃清他在部队文艺幹部中所散布的毒素，和他在社会上的惡劣影响；为了巩固党的团結，維护党的紀律的严肃性；机关党委决定將陈沂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此决定已經总政治部、軍委、中央批准）

中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編輯部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用文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日

（一）

陈用文，原名陈祖抗，男，四十岁，南京人，破落商人家庭出身，本人成份职員（在金陵兵工厂名义是艺徒，实际前三年替領导开單据領材料，后三年多在成本会計科抄写），回族。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員会股長、研究員，晋察冀边区总工会任执委、秘書長、中央政策研究室

研究員，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秘書处处長，办公厅第二副主任等工作。一九五〇年至現在，任工人日报社長和工人日报分党組書記，一九五七年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員会委員和主席团委員。

（二）

一九五六年十月，当英美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鉄托集团制造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在世界上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的时候，陈用文正从南斯拉夫訪問回国。他于同年十一月在工人日报上發表了"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竭力宣揚鉄托的修正主义，美化南斯拉夫，宣揚南斯拉夫的工人理事会的作用，吹嘘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的成績，鼓吹南斯拉夫沒有官僚主义。此外，他还到处作报告，並在报社开座談会，全面地宣揚鉄托的道路。

一九五七年春天，当国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陈用文于同年五月，發表了反动文章"西行紀要"，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在这篇文章中，陈用文大肆攻击党，把党說成是社会前进的主要障碍，污蔑党干涉和破坏了工会的独立性，公开宣揚工会和党可以不一致，鼓动工会幹部可以用团結——斗爭——团結的方式去克服党的"片面性"，咒駡群众在組織上服从党是"宗派主义傾向"；他利用工人中的落后思想、利用监督，煽动群众向行政作斗爭；鼓动工人要求極端民主，他对工人阶級極力丑化、污蔑，把工人說成都是自私的。他夸大我們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把整个西北地区說成漆黑一团。

陈用文的这兩篇文章和美化南斯拉夫的报告，成为上海、江苏、山东、广东、广西、山西、安徽、河南等省市工会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炮彈，並且在广大工会幹部当中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此外，陈用文还以工人日报社長的地位，八年来利用报紙进

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他利用报紙反对党对工会的領导。远在一九五〇年，陈用文就在报紙上散佈党不能領导工会的謬論；第一次全总党組扩大会議的决議一直不在宣傳中認眞貫徹；抓住机会就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更严重的是：在工会"八大"以后，陈用文在"遵守工会章程"的社論里，对中央規定的"中国工会是按照产業和地方相結合的原則組織起来的"工运方針，採取了公然抗拒的态度。說什么"这和'七大'章程在实际工作中沒有什么根本改变"。去年右派大举向党进攻时，陈用文不理中央"工人日报以生产宣傳为中心"的指示，除自己抛出反党綱領"西行紀要"外，还要編輯部"对企業內部矛盾可以放手揭"，"工会工作要冲破圈子鳴"，此外，他还一貫利用落后群众来信，加以集中夸大，惡毒攻击党和無产阶級專政的国家政权。

（三）

陈用文热衷于这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不是偶然的。陈用文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因襲了旧商人損人利己、投机取巧的衣鉢。他参加党是抱有卑鄙的个人野心的，企圖利用党作为他向上爬的工具。一九三七年他在延安曾簽名加入过由托派分子所發起的"卡尔学会"。一九三八年在汉陽兵工厂鬧个人突出被捕，曾使党組織遭受严重損失。一九五一年曾犯过經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严重錯誤。在工人日报期間，对历次政治运动一貫消極抵抗，同情反革命和右派分子，把工人日报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对待幹部用尽打、拉、吹、拍、騙等資产阶級各种权术。生活上也是腐化墮落的。多少年来，党对他的反党思想和行为，曾不断进行教育和批評，但他都採取兩面手法，拒絕改造。陈用文在前述的反党的罪惡活动揭發后，态度極不老实，不肯主动交代全部罪行，企圖蒙混过关。陈用文是一个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是一个徹头徹尾的修正主义者，他已經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成

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兇惡的敌人。因此，支部大会于八月三日一致决定开除陈用文的党籍，並撤消其一切职务。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孙汉卿、矯楓、崔介等七人党籍的报告

中央：

今年春天，青島市委在整風运动中徹底揭發了市委書記处書記孙汉卿（省委委員）、矯楓，副市長崔介，市委委員、宣傳部長孙朴風，文教部副部長余光前，国棉一厂党委書記王偉等人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惡活动。同时並揭發了青島日报社总編輯顧膺陰謀篡改党报性質、与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勾結向党进攻的罪行。

对于孙汉卿等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省委已派人去青島进行了認眞負責的查对，証明完全屬实。为此，省委除完全同意青島市一届二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开除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顧膺党籍的决議，同意其建議决定开除孙汉卿的党籍外，並确定余光前作为坏分子处理。但在最后具体处理上，可根据他們对待錯誤的态度和悔改的程度有所区别，以体現党的政策。特此报告。

中共山东省委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青島市第一屆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关于开除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顧膺党籍及建議省委开除孙汉卿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青島市第一屆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及一屆二次代表大会預备会議，坚决地貫徹执行了中央的整風指示和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的方針，徹底地揭發批判和粉碎了市委書記处書記孙汉卿，市委書記处書記矯楓，青島市副市長崔介，市委委員、宣傳部長孙朴風，市委文教部副部長余光前，国棉一厂党委書記王偉等人所結成的右派反党集团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代表大会討論审查了並一致同意市委“关于以孙汉卿、矯楓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問題的报告”。代表大会一致認为：这是青島党組織內一場兩条道路斗爭中的敌我斗爭。青島党組織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領导下，取得了这場斗爭的胜利。这場斗爭的胜利，对于增强青島党組織在中央和省委統一領导下的团結和統一，对于純潔和巩固青島党的思想与組織，对于提高青島党組織的覚悟和战斗力，对于促进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会議揭發的材料証明：孙汉卿和矯楓是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头子，他們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惡活动，他們已經完全墮落成党內右派分子，他們是党的叛徒，是資产阶級在党內的代理人。孙汉卿和矯楓勾結在一起，坚决的反对和破坏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大鳴大放时，他們积極

心，千方百計的抗拒中央的方針政策路綫和省委的指示。他們反对貫徹毛主席調动一切积極因素为社会主义事業服务的方針，反对中央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的方針，反对中央和省委关于反右派斗爭的指示。企圖用他們的資产阶級主張代替党的方針政策路綫。

会議揭發的材料証明：青島市副市長崔介是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幹分子，是党內的右派分子。他平日与青島民建副主委、資产阶級右派分子葛慎修称兄道弟，亲如家人。大鳴大放时，他鼓励和支持葛慎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反右派时，他为葛出主意，改文章，以掩盖葛慎修的右派面目，陰謀保护葛慎修过关。他鼓励支持青島民革主委、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徐一貫向党进攻，称贊徐一貫攻击党的領导、攻击肃反运动的反动謬論，支持徐一貫提出为反革命翻案的四項反动主張。在向右派分子孙朴風开展斗爭的市委全体（扩大）会議上，他不揭發斗爭右派分子孙朴風，反而攻击市委，陰謀从市委內部制造混乱，救出孙朴風。崔介同右派反党集团头子孙汉卿、矯楓結合在一起，进行夺取市委和市人委領导权的反党活动。他經常散布流言蜚語，攻击市委和市人委的領导，他同孙汉卿、矯楓結合在一起在市委和市人委搞了一个反党中心。崔介的反党活动早就开始了，土改时包庇地主，入城后成了向明等人进行反党活动的帮凶，並繼承了向明的右傾投降主义路綫，包庇反革命，生活腐化，道德敗坏，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

会議前揭發的材料証明：市委委員、市委宣傳部長孙朴風是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幹分子，是党內右派分子。他在大鳴大放时，积極的支持和宣揚儲安平的"党天下"謬論，称贊儲安平的謬論是"挖到老根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市一屆三次政协会議上公开的背叛党和党外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省委宣傳会議上，与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互相勾結，一唱一和的向党进攻。他極力支持十七中学的右派分子召开大会向党进

攻，並贊揚右派分子对党的攻击是“馬列主义”。他积極宣揚草木篇“艺术性很高”、“表达頑强性突出”。並仿草木篇作詩汚蔑党，頌揚右派分子。他汚蔑党的肃反运动“違犯宪法”，汚蔑党的幹部“和国民党一样”。他利用党的思想工作陣地散布人与人的关系“沒有以經济为基础的阶級界限了”的阶級斗爭熄灭論；反对党的根本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把党的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同官僚主义混为一談；他散布“壟断資本集团本身的矛盾也是战争与和平的矛盾，是为了利潤要战争与为了利潤不贊成战爭的矛盾”的謬論。在反右派斗爭时，他極力反对中央关于开展反右派斗爭的指示。他同右派反党集团头子孙汉卿、矯楓結合在一起搞了个反党中心，企圖篡夺市委的領导。孙汉卿的反党活动是有历史根源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抗战初期因貪生怕死政治动搖，受停止組織关系的处分。一九四二年党派他回原籍作地下工作，他沒作工作，反而动員群众資敌。

会議揭發的材料証明：市委文教部副部長余光前是右派反党集团的成員，是党內的右派分子。她平日为孙汉卿、矯楓、崔介夺取党、政領导权积極活动，散布流言蜚語，攻击市委領导。她为右派分子孙朴風打掩护。在一屆二次党代表大会預备会議上，她蛮横的数次打断别人的大会發言，阻止对右派反党集团的揭發。她为右派反党集团訂立攻守同盟，为右派反党集团拉攏同情人，为右派反党集团打掩护，她造謠汚蔑党代表大会預备会議。在会議揭發批判她的反党言行时，她拒不到会，並蛮横的說要砸倒牆打死組織上派去要她交代問題的同志。她平日生活腐化，道德敗坏，狂妄跋扈，毫無共产党員气味。

会議前揭發的材料証明：国棉一厂党委書記王偉是右派反党集团的成員，是党內的右派分子。他参加了一个反党地下組織“文友社”。他与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紧密配合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他对山东大学部分学生在右派分子煽动下鬧青島日报社兴高彩烈，他在右派向党进攻时积極配合指示在全厂广播“民盟發展

史和在革命中的作用"。他造謠汚蔑党的、中国人民的領袖。他贊揚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他竭力宣傳資产阶級生活方式。他与右派反党集团头子孙汉卿結合起来进行反党宗派活动，散布流言蜚語，汚蔑和攻击市委的領导，陰謀使市委負責同志从基層选举中落选。在一屆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积極支持孙汉卿、矯楓打击排除異己、安插亲信的陰謀活动，造謠陷害党的好同志。

上述材料証明：孙汉卿、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等人，都是党內右派分子。他們結成了右派反党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惡活动。这个右派反党集团，以孙汉卿、矯楓为首，他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但是他們一直拒絕党对他們的批評教育，至今沒有悔改的誠意，不肯向党向人民低头認罪，特别是孙汉卿的态度尤为惡劣，自絕于党，自絕于人民。

代表大会一致指出：孙汉卿、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等人是窃居了党的重要領导职位的右派分子，他們所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惡活动，对党的事業的危害是極大的。也必須指出：由于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領导，由于市委和各級党組織坚决的、忠实的貫徹执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路綫和省委的指示，由于青島市各級党組織基本上是团結的並团結了全市人民，青島市一年半来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但是由于孙汉卿、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等右派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惡活动，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党的威信，損害了党的团結，妨碍了党的統一集中領导，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因此，必須把他們清除出党。

代表大会一致决議：撤銷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党內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並向有关方面建議撤銷他們的一切行政职务。鑒于孙汉卿是省委委員，代表大会一致决議：建議省委撤銷其党內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並向有关方面建設撤銷其一切行政职务。代表大会一致認为只有这样，才能維护党在政治

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純潔，使党在紧急关头，經得住風險。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島党組織更好的团結在中央和省委的統一領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历史任务。

根据会前揭發的材材証明：市委委員、青島日报社总編輯顧膺是党內右派分子。他陰謀篡改党报的性質，从根本上否定党报是阶級斗爭工具，散布"报紙是商品"，"要象公共汽車那样，不論誰上都行，不論誰的文章都登"的反动謬論。污蔑在我們国家里沒有新聞自由，"記者遭遇到种种困难"。他陰謀夺取党对报紙的領导权，主張"再成立一个編委会与党报編委会共存、监督、爭鳴之"，主張"办兩种报紙"与党报"唱对台戏"。他極力反对、攻击省委和市委对党报的領导。並同以孙汉卿、矯楓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分子有联合的反党活动。他污蔑党的肃反运动"違犯宪法"。在党外資产阶級右派向党进攻时，他兴高彩烈的称贊为"眞是大好时光"。他与党外右派分子勾結一起向党进攻，他要"动員輿論"，"轟出一个全市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浪潮"。在一九五七年市一届三次政协会議上，他明目張胆的和党外右派分子陈仰之勾結起来，向党进攻，陰謀迫使党承認右派分子在政协会上对党的进攻是"正确"的。

代表大会一致决議：撤銷顧膺党內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並建議有关方面撤銷其党外一切行政职务。

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是万惡的根源。孙汉卿、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和顧膺都是極端自私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者，他們都有卑鄙的資产阶級个人野心，念念不忘个人的名利、地位。在他們的資产阶級个人野心得不到滿足时，就对党不滿，进行反党活动，以至墮落成党內右派分子，成为党的叛徒。这是他們一步步的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这是他們墮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內右派分子的思想根源。

孙汉卿、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和顧膺所以墮

落成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我們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历史时期，資本主义所有制被消灭了，資产阶級也正在被消灭中，資产阶級分子正在被改造中。但是阶級斗爭还沒有熄灭，資产阶級的政治观点和資产阶級的世界观还在很多人的头腦中存在着，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爭，还將存在一个很長的时間。这种斗爭必然反映到党內来。特别是在政治上阶級斗爭激化的时候，党內的这种斗爭也必然会激化起来。孙汉卿、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和顧腾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發展的时期，最后同党决裂，墮落成党內右派分子，正是这一矛盾和斗爭的具体表現。他們大都是出身地主家庭或受剝削阶級影响很深的旧知識分子，他們入党以后，一直沒有自我改造的自覺性，甚至拒絕党对他們的教育改造。保持着剝削阶級的思想本質。他們的这种剝削阶級本質，同党的原則、同共产主义思想、同党与人民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一有机会就力圖散布他們的影响，企圖按照他們的資产阶級面貌来改造我們的党。如果說在前几个革命时期他們的眞正面目还可以掩盖，但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特别是在进行深入的徹底的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他們就不可能掩盖住其本来的面目，党要进行深入的徹底的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們却要按照資产阶級面貌来改造我們的党，因此他們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惡活动，直到最后同党决裂，墮落成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成为党的叛徒。这就是社会阶級斗爭在党內的反映，这就是他們墮落成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社会历史根源。

从揭發出来的材料可以看出，孙汉卿、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和顧腾等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同党外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一样。他們积極支持党內外右派分子並亲自出馬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爭时，他們千方百計的保护右派过关。他們处心积虑的进行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的罪惡活动。他

們歪曲、篡改中央的方針政策路綫和省委的指示。他們的这些罪惡活动，集中的反映和代表了資产阶級的利益和願望，同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也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党同他們展开的斗爭，是两条道路斗爭中的敌我斗爭。青島党組織由于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領导下团結一致，取得了这場斗爭的胜利。为了增强青島党組織在中央和省委統一領导下的团結和統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完成党所賦予我們的光荣任务，代表大会認为全市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員必須吸取以下的教訓：

第一，必須把整風与反右派斗爭进行到底，必須把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須堅决貫徹执行中央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的方針。这样就既能很好的暴露和解决两条道路斗爭中的敌我矛盾，也能很好的暴露和解决两条道路斗爭中的人民內部矛盾。这样，就一定能鍛煉提高左派，一定能团結教育改造中間派，一定能打垮反革命派——右派。这样就一定能推动社会主义事業一日千里的飞躍前进。

第二，必須堅决地、忠实地貫徹执行中央的方針政策路綫和省委的指示，反对对党的方針政策路綫的任何歪曲和篡改，为保衛党的方針政策路綫而斗爭，只要这样，我們的各項工作一定能取得很大的成績。为此：首先必須深入学習全面理解党的方針政策路綫。只有如此才能正确的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路綫。其次，必須不断的向歪曲和篡改党的方針政策路綫的傾向开展不調和的斗爭。要知道，在今后整个过渡时期，不管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或处理敌我矛盾，都必然反映出堅决的执行党的方針政策路綫同反对党的方針政策路綫之間的斗爭。而任何一个隐藏在党內的阶級敌人，都是極力的歪曲和篡改党的方針政策路綫的。因此，能不能战胜各种錯誤傾向保衛和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路綫，在目前时期內，就是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問題。再次，貫徹党的方針政策必須从当前的形势出發，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形势的發展是时紧时松的，

阶級斗爭的形势是有起伏的。随着形势的發展有时要着重强調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有时要着重强調处理敌我矛盾。因此，我們运用党的方針政策去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的矛盾时，必須从实际出發，具体分析，抓住主要矛盾。否则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錯誤。

第三，党的团結和統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每一个党員都必須自觉的維护在中央和省委統一領导下的党的团結和統一，有利于党的团結和統一的話就說，不利于党的团結和統一的話就不說，有利于党的团結和統一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結和統一的事就不做。必須加强政治責任心，自觉的同危害党的团結和統一的不良傾向开展斗爭；必須加强党的組織观念和組織性紀律性，反对缺乏組織观念、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的分散主义；必須增强党性，克服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只要这样做了，党的团結和統一就有了保障，党的战斗力就一定会增强，党就能無坚不摧，無往不胜。

第四，必須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基本組織原則，它一方面能够保証党的領导、党的意志、党的行动的集中和統一，另一方面又能使党的生活生气勃勃，充分的發揮每一个党員在統一和集中指导下的积极性和創造性。这正是我們党的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因此，每一个党員都必須自觉的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向一切違犯和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傾向开展斗爭。必須加强党委集体領导制度。坚持重大問題一定要集体討論、集体决定的原則，反对个人决定重大問題。提倡在党的会議上不隐瞞自己的观点，公开自己的观点，自由爭論，作出决議之后，必須無条件的执行，反对陽奉陰違。坚决执行党員个人必須服从党的組織，少数必須服从多数，下級組織必須服从上級組織，全国的各个組織必須統一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員会的原則，反对無組織無紀律。坚持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的方針，充分發揚党內民主，活躍党內民主生活，充分發揮每一个

党員在統一集中指导下的积極性和創造性。經常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加强党对党員执行党的决議的监督。

第五，每一个党員都必須自觉的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經常不断的克服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是万惡的根源。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發展的时期中，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是代表反动阶級利益的思想傾向，对党的危害最大。因为，形形色色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是同共产主义思想絕对对立的，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危害最大，必須狠狠的予以打击。必須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發展的时期，全心全意为党的事業而斗争还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斗争，就是無产阶級同資产阶級两个立場的斗争，就是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同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誰能在这場斗争中，克服了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誰就能过好社会主义关，否則，社会主义关是过不去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是只能克服不能掩盖，誰要怕痛、不肯割掉这条尾巴，任其發展，就必然和孙汉卿、矯楓、崔介等人得到同样的下場。因此，每一个党員都必須自覚的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克服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党的利益同个人利益發生冲突时毫不犹豫的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

最后，代表大会一致認为有必要提醒全党注意，在我們取得了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必須高度的警惕和防止产生驕傲自滿情緒，要謙虚謹愼，戒驕戒躁，勤勤恳恳，兢兢業業地为社会主义事業努力学習、积極工作。

代表大会决定：將本决議及市委"关于以孙汉卿、矯楓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問題的报告"向全市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員进行傳达，並結合实际情况認眞的进行討論，提高全党的覺悟，克服各种錯誤傾向，以进一步增强青島党組織在中央和省委統一領导下的团結，提高党的战斗力，以便团結全市人民，推动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躍进，为完成党所賦予我們的光荣任务
艰苦奋斗。